

## 蔣經國與國防部情報局團體意識之建立 ——以《健行月刊》為中心（1950-1970）

陳昶安

### 摘要

在1946年戴笠意外過世後，其帶領的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經歷了改組及國共內戰，改組為國防部保密局，隨中華民國政府遷移來臺。在1955年再次改組為國防部情報局（以下簡稱為情報局）負責情報蒐集及對大陸工作。

為鞏固政權的中國國民黨，在遷臺後意圖透過組織的改造，重整並掌握黨務、政府、軍隊、情報等部門，建立其統治體系。在此規畫下，蔣經國受命出任國防會議副秘書長，並實際掌握國家安全工作與情治體系，情報局即為重要單位之一。

本文主要探討情報局人員為了凝聚其團體的向心力及自我認同，透過私人著作及內部刊物《健行月刊》回憶戴笠的點滴，在形塑集體記憶的同時，也將戴笠塑造成情報局不可或缺的典範；而蔣經國則透過一連串紀念性、儀式性活動，將戴笠以及其「公忠體國」的形象，樹立為情報局人員應以效法的模範，並利用這樣的形象達成其掌控機構的目的，亦安撫情報局人員對機構改組的疑慮，同時展現對情報局的重視。在反攻大陸、反共政策的氛圍下，蔣經國以打造戴笠公忠體國形象，從而鞏固情報局內部的團體意識。

關鍵詞：情報局、健行月刊、戴笠、蔣經國、集體記憶

# Chiang Ching-kuo and the Ethos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Intelligence Bureau: An Examination of the *Chien-hsing Monthly*, 1950-1970

Chang-an Chen<sup>\*</sup>

## Abstract

The Military Investigation and Statistics Bureau was reorganized after the death of its leader, Dai Li in 1946. As the Kuomintang (KMT) was defeated by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in the Civil War, the Bureau followed the governm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o Taiwan. In 1955, it was renamed the Intelligence Bureau and placed under the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MDIB), now tasked with intelligence gathering and covert operations on Mainland China.

When the KMT was relocated to Taiwan, it intended to take full control of party affairs, governmental power, the army, and the intelligence agencies through a thorough reorganiz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Chiang Ching-kuo was appointed as deputy secretary-general of the National Defense Conference and given actual responsibilities for national security, overseeing all intelligence agencies. The MDIB was among those agencies.

This article examines how the MDIB agents consolidated their self-identity and institutional ethos through the collective memory of, and reminiscent writings about, Dai Li. Most of their writings were published in the MDIB's restricted publication, *Chien-hsing Monthly*. They turned Dai Li into an indispensable symbol of the MDIB. By promoting commemorative and ceremonial behaviors that honored Dai Li, Chiang Ching-kuo further established Dai as a perfect model of loyalty that all MDIB agents should follow and hinted the unique importance of MDIB due to this legacy. *Chien-hsing Monthly* thus became an important instrument in Chiang's effort. In order to carry out the mission of "Retaking the Mainland" and an Anti-Communist agenda, Chiang Ching-kuo inspired the MDIB agents to emulate Dai Li's loyalty as an integral part of their collective ethos. In so doing he also strengthened his own control over the agency.

**Keywords:** MDIB, *Chien-hsing Monthly*, Dai Li, Chiang Ching-kuo, Collective Memory

---

<sup>\*</sup> Assistant Researcher, Academia Historica

# 蔣經國與國防部情報局團體意識之建立 ——以《健行月刊》為中心（1950-1970）\*

陳昶安\*\*

## 壹、前言

1946年3月17日，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以下簡稱軍統局）局長戴笠的飛機撞山失事，軍統局頓時群龍無首，蔣中正下令由鄭介民代理局長，唐縱、毛人鳳代理副局長。時值國共內戰時期，雙方鬥爭激烈的同時，軍統局也面臨改組及組織整併的問題。1946年8月，軍統局奉命改組為國防部保密局（以下簡稱保密局），由時任「北平軍事調處執行部」委員、國防部第二廳廳長的鄭介民兼任局長。<sup>1</sup>然而鄭介民因事務繁多，局內事務多由毛人鳳負責處理，至1947年底毛人鳳正式接掌保密局。<sup>2</sup>戡亂戰事不利，1949年1月，蔣中正自中華民國總統職位下野後，保密局再分為公開及秘密兩部，公開部分由徐志道負責，作為公務機構隨中華民國政府轉進；秘密部分則由毛人鳳負責，繼續率領大部分人員進行地下情

---

\* 承蒙蘇聖雄先生惠賜寶貴意見以及匿名審查人提供許多修改建議及指點研究方向，使本文研究論述能趨向完備，謹此特表謝忱。

收稿日期：2020年5月27日；通過刊登日期：2020年9月23日。

\*\* 國史館修纂處助修

<sup>1</sup> 羅久蓉，〈從軍統局到保密局〉，收入吳淑鳳等編，《不可忽視的戰場——抗戰時期的軍統局》（臺北：國史館，2013年2刷），頁285-288；國防部情報局編，《國防部情報局史要彙編》，上冊（臺北：國防部情報局，1962年），頁83。

<sup>2</sup> 鄭鐸編著，《軍情局密史》（臺北：聯豐書報社，1988年），頁196。

報活動，但仍難挽大勢，最後保密局隨中華民國政府撤退來臺並回復組織，公開及秘密兩部合併重新編組，負責保防、偵查作業及對大陸地區的工作。<sup>3</sup> 1955年改組為國防部情報局（以下簡稱情報局），仍然負責情報蒐集作業。由國家安全局主導，情報局以及司法行政部調查局（今日之法務部調查局）等情治單位，分別負責海內外、臺灣島內的情蒐及保密偵查，為政府情報體系的重要部分。1985年情報局再與國防部特種情報室合併成立國防部軍事情報局。

政府在大陸地區與中國共產黨的重要戰役相繼失敗，輾轉撤退到臺灣，蔣中正利用中國國民黨總裁辦公室掌控政局並運作復行視事。在恢復總統職位站穩腳步後，蔣中正即以國民黨總裁的身分開始國民黨的改革與改造，藉由將權力收攏，重新改造國民黨，以圖重新振作。1950年成立「中央改造委員會」命陳誠、蔣經國等人為改造委員，改組國民黨的領導階層，重新建立基層組織。蔣中正利用改造的過程，集中權力，逐步清除過去黨內的各方派系，此時的蔣經國亦扮演重要角色——幹部訓練委員會主任委員，接手重要職務。<sup>4</sup>

1949年7月，蔣中正召集情報工作首長及親信，在高雄成立「政治行動委員會」，指定蔣經國、唐縱、鄭介民、毛人鳳等人為委員，其作用在於統一情報機關的思想與工作，並強化情報運用。「政治行動委員會」後來變為「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sup>5</sup> 在國家安全局（以下簡稱國安局）成立之前，臺灣的情治系統分工混亂，缺乏協調性。<sup>6</sup> 1954年國防會議改組，並於次年成立國安局，取消「總統府機要室資料組」。蔣經國以國防會議副秘書長身分透過國安局掌控各情治單

<sup>3</sup> 「本局編制」，〈國防部保密局組織編制〉，《軍情局（抗戰時期數位檔）》（以下簡稱《軍情局》），國史館藏，典藏號：148-010200-0008，頁175-182；國防部情報局編，《國防部情報局史要彙編》，上冊，頁4、83；鄭鐸，《軍情局密史》，頁177-178。

<sup>4</sup> 金智，〈蔣經國與臺灣黨國體制的建構〉（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8年），頁7、211-216。

<sup>5</sup> 孫家麒，《我所認識的蔣經國》（香港：大生活出版社，1975年），頁21-25；「民國四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蔣經國於劍潭新莊志清堂對情報治安工作人員演講展開新的工作完成新的任務」（1955年4月22日），〈專著手札與講詞〉，《蔣經國總統文物》（以下簡稱《經國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5-010503-00016-005，頁18。

<sup>6</sup> 高明輝，《情治檔案：一個老調查員的自述》（臺北：商周文化公司，1995年），頁131-139。

位的業務，成為情報工作的領導人。<sup>7</sup> 另一方面，蔣經國亦為國防部政治部主任（後為國防部總政治部主任），重新建立國軍政工制度，意在對軍隊進行監察、保防以及加強對官兵的政治思想教育，企圖掌握對軍隊的控制權，以求統治基礎的穩固。<sup>8</sup> 經由一連串改造與改組，蔣中正讓蔣經國對黨務、政權、軍隊、情報，逐步掌握，尤其是情治系統，在「保密防諜」的時代氛圍下，透過機構整合及人事調整，建立其統治體系。<sup>9</sup> 而蔣經國也自承在當年現實的環境下，擔當情報工作的重要性。<sup>10</sup> 然而，由國安局統合的情治系統至少有十一個單位，其主要任務在於對內部控制、對大陸情報工作及爭取美日、海外僑胞社群的支持等。<sup>11</sup> 蔣經國曾在工作會報上指出各情治系統單位都有其任務，彼此間應相互協調合作，達成政策目標。<sup>12</sup>

<sup>7</sup> 蔣經國自1954年9月起擔任國防會議副秘書長，1964年3月擔任國防部副部長，同年6月擔任行政院副院長。1955年3月國安局正式成立，隸屬於國防會議，由鄭介民擔任局長，陳大慶擔任副局長。1967年國防會議撤銷，改置國防安全會議，國安局隨之改隸。國安局對情治機關的權責：「為求情報政策之統一，安全局對有關情報保防機關負有『督導』、『協調』和『聯繫』之責。督導之目的為政策之執行；協調之目的為工作之配合；聯繫之目的為精神之一致。」所以國安局還是負責統合協調國安情報工作的推行。參見金智，〈蔣經國與臺灣黨國體制的建構〉，頁283-284；陶涵（Jay Taylor）著，林添貴譯，《臺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頁230；「國防會議簡史（一）」（1967年2月27日），〈忠勤檔案〉，《經國檔案》，典藏號：005-010100-00043-001，頁36-47、79-82。

<sup>8</sup> 蔣經國在政工幹校即不斷對學員強調效忠領袖及犧牲精神。參見陳鴻獻，〈1950年代初期國軍政工制度的重建〉，《國史館館刊》，第42期（2014年12月），頁63-84；金智，〈蔣經國與臺灣黨國體制的建構〉，頁176-186。

<sup>9</sup> 劉照明，〈蔣經國與蔣中正「在戒嚴時期」不當審判」的角色〉，《臺灣史研究》，第6卷第2期（1999年12月），頁148-150；唐柱國，《最高機密：高階諜報員首度公開國民黨情報密史》（臺北：新新聞文化公司，1997年），頁37-46。

<sup>10</sup> 蔣經國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要負責負全責負責到底——民國四十二年十二月在石牌訓練班講〉，《蔣經國先生全集》，第4冊（臺北：行政院新聞局，1991年），頁592-593。

<sup>11</sup> Steve E. Philips, "Taiwan's Intelligence Reform in An Age of Democratization," in Thomas C. Bruneau and Steve C. Boraz, eds., *Reforming Intelligence* (Austin, Texas: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07), p. 173.

<sup>12</sup> 臺灣的情報治安單位：國防部情報局、司法行政部調查局、國防部情報參謀次長室、臺灣警備總司令部、臺灣省警務處、國家安全局、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二組、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六組、國防部技術研究室、國防部總政治部、憲兵司令部等共十一個單位統合協調在國家安全工作會議之下。雖名為統合協調，但同樣有各單位缺乏協調的問題。「民國四十八年四月十五日蔣經國於國家安全工作會議演講稿」（1959年4月15日），

有論者認為國民黨政權來臺後的改造運動並未成功，其無法建構有效的「意識形態」理論來強化黨的組織，再由黨組織來動員民眾。僅倚靠由上而下的儒家道德說教及領袖崇拜，根本無法長期凝聚人心，黨的組織亦無法向下扎根，無法確實動員黨員，對外得訴諸官兵的思鄉情節支撐「反攻大陸」的目標。此論者進一步說明蔣經國亦長期忽略「意識形態」的重要性，其言論只談現實工作方法及態度，甚少提及深入的思想內容；由於國民黨政府無法建立堅韌厚實的「意識形態」凝聚人心，也無法對社會扎根，只能倚靠日本殖民政府遺留下的行政體系和本身的情治體系來掌控臺灣社會。<sup>13</sup> 國民黨在臺對內意識形態影響力薄弱，對外則憑藉著海峽天險與美國在政治、軍事、經濟方面的支持，支撐其統治。<sup>14</sup>

國民黨透過改造運動建立統治體系，一是為了集中統治權力；二則是將反攻大陸做為目標。倘若前述所言，改造運動全然失敗，無法建立意識形態，僅能倚靠過去殖民政府的行政體系、海峽的隔絕、美國的支持及藉由情治系統，穩定在島內初期的統治。那麼可向前延伸思考一個問題，在遷臺初期，國民黨政府是倚靠何者重建並掌握情報體系？難道僅僅是人事的命令及利益的交換？顯然不僅於此，可能還有愛國情操及精忠報國等等意識形態的灌輸等。

以情報局為例，根據研究成果，在其前身軍統局時期，戴笠在建立情報組織時就想過應建立有別於西方的情報組織，中國的情報組織應結合忠、孝、仁、義等中國特色的概念，建立成結合的團體。因此戴笠從《三國演義》、《水滸傳》等歷史故事及小說中擷取靈感，除了要求下屬絕對地犧牲、服從外，不斷地強調結義情感及俠義之風，藉此激發情治人員的英雄主義，使其在抗日戰爭中能在敵後執行地下工作。<sup>15</sup> 戴笠自身在講述團體的精神時即提到：

---

〈專著手札與講詞〉，《經國檔》，典藏號：005-010503-00030-003，頁35-47。

<sup>13</sup> 石佳音，〈中國國民黨的意識形態與組織特質〉（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論文，2008年），頁110-112、166。論者認為蔣經國早年留學蘇俄，應該更清楚建立意識形態的重要性，

<sup>14</sup> 石佳音，〈中國國民黨的意識形態與組織特質〉，頁112-113。

<sup>15</sup> 軍統局前身為三民主義力行社特務處，1938年8月改組為今所熟悉的軍統局，由賀耀組兼任局長，實際事務由副局長戴笠負責。蕭李居，〈戴笠與特務處情報工作組織的開展〉，收入吳淑鳳等編，《不可忽視的戰場——抗戰時期的軍統局》，頁1-4。Yeh Wen-Hsin, "Dai Li and Liu Geqing Affair: Heroism in 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8:3 (August 1989), pp. 546-549.

各位要知道，我們這個團體絕不是採取俄國「格伯烏」、德國「吉士搭波」的特工方式來統制的！因為中國有中國的歷史文化，中國人有中國的傳統精神；中國人的傳統精神是甚麼？總理講「忠孝仁愛信義和平」，領袖講「禮義廉恥」。我們掌握團體，運用組織，就是本著這種精神作出發點，以主義領導，以理智運用，以情感結納，以紀律維繫；唯有如此，所以能使主義與道義的結合凝為一體，愈久愈堅，誰——不論是日本人、汪精衛、共產黨——都沒有辦法來破壞我們！<sup>16</sup>

戴笠想將傳統文化與主義相融合，形成堅韌的團體精神來規範並驅策情報人員執行任務，對抗敵人。換言之，戴笠做為團體的大家長，對部屬的照顧與懲戒，就是為了換取部屬對規範與命令的遵從，是一種忠誠與義務的交換。<sup>17</sup> 戴以其獨特的領導風格，使軍統局在對日抗戰中發揮了不少作用。

但因為抗戰期間軍統局相關組織及人員不斷擴張，除情報工作外還負責交通運輸、郵電通信及對其他機關的檢查工作，另外也掌握部分的警察系統。<sup>18</sup> 在戰後即面臨國家進入憲政體制及組織整併改組的問題，牽涉到權力的掌握以及日後組織的走向。戴笠突然意外身亡以及組織改造等事，的確一度造成衝擊，使軍統局內部成員人心惶惶。<sup>19</sup> 一則戴笠身亡後，內部無人能完全承擔起他的角色，因為無法像他一樣掌控組織。<sup>20</sup> 二則軍統局改制為保密局過程中，面臨許多問題，

<sup>16</sup> 費雲文編，《戴雨農先生全集》，上冊（臺北：國防部軍事情報局，1979年），頁317-318；王蒲臣，〈戴笠將軍與中國特工（一）〉，《暢流》，第57卷第12期（1978年8月），頁3。

<sup>17</sup> 魏斐德（Frederic E. Wakeman）著，梁禾譯，《特工教父——戴笠和他的秘勤組織》，下冊（臺北：時英出版社，2004年），頁461-462。

<sup>18</sup> 范育誠對戰後軍統局改制為保密局的過程轉折，及組織的合併整編有詳細的描述跟分析。見范育誠，〈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改制之研究（1945-1949）〉（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6年），頁1-3。

<sup>19</sup> 曾擔任情報局副局長荊自立回憶：「自戴笠走後，局裏〔按：裡〕工作一如往常，照樣推動，不過同志心理上的感受，難免有些空虛、不定、遲疑及憂慮。不知道軍統局會不會繼續存在，會不會改組及縮編，以及誰會是實際領導人。有人甚至說，政治的複雜及敏感，不是我們可以瞭解及想像的，如果要改組或編併，軍統局內部的許多檔案，都不宜繼續保存。」荊自立，《雲煙往事》（洛杉磯：世界日報，2014年），頁197-199。另見國防部史政局編印，《毛人鳳傳》（臺北：國防部史政局，1962年），頁2。

<sup>20</sup> 唐縱評論戴笠的領導作風：「（徐）佛觀謂軍統局人希望我負責。但我太弱，恐有不能壓制之勢，因雨農以英雄作風控制整個局面，我以聖賢態度領導，勢將無法控制。余笑領

例如將原本掌握的警察系統分割成其他機關，情報相關工作歸給國防部第二廳及保密局。但保密局與國防部第二廳業務難以分割，保密局本身位階不明確，機構的公開與隱藏以及編制縮減、預算縮減、人員裁汰等等各項制度與業務的較力與牽扯，亦造成人員士氣低落。<sup>21</sup> 隨著戡亂情勢漸趨嚴峻，保密局於各地布建的據點多遭破壞，人員與機構陸續遷至臺灣。除了重新建立組織與行動外，如何在臺灣凝聚情治人員的人心，並恢復對團體的向心力亦為首要任務。其次則是如何在保密局改組為情報局後，使人員能各安其位，執行對大陸工作。

從常理推斷，主政者在統合各個情治單位時，為使情治人員效忠國家與政府，思想的灌輸及團體精神的建立似乎是當然之事，但隨著各個單位的任務與歷史淵源的差異，建立的形式或有不同。就情報局的歷史而言，戴笠極具實質影響力，但對遷臺後的保密局是否仍具有象徵的意義？有時團體精神的建立，不一定全來自深切的理論或思想，也不僅僅來自對上效忠的說教，因為深邃的概念有時不易理解，而持續性的思想灌輸難免會流於形式。在團體精神建立的背後，可能需要更為具體的意象作為輔助，而團體的凝聚力可能來自個別團體的集體記憶與自我認同的形塑，以及認同被形塑後的象徵意義。本文擬以國史館所藏《軍情局》檔案中，有關情報局在臺初期發行的內部刊物——《健行月刊》及其前身《家風月刊》（1957年8月起和其他刊物合併改稱，「健行」應取自戴笠化名「馬健行」）<sup>22</sup> 及其他相關檔案資料，來說明情報局人員如何形塑自我認同，以及情治工作的主政者蔣經國，藉由該認同順水推舟，加強與情報局（情報體系）的相互連結關係。由於該刊物以數位化檔案方式保存，故以檔案格式記之。

---

之。雨農的作風，對上絕對服從，不計利害以達成任務，使上信任；對下絕對控制，不顧輿情，以殘酷手段，使下知所懼。這是他事功成就的兩大法則。」見唐縱著，《唐縱失落在大陸的日記》（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98年），頁577；魏斐德著，梁禾譯，《特工教父——戴笠和他的秘勤組織》，下冊，頁782-783。

<sup>21</sup> 軍統局改制後分為交通部交通警察總局、國防部保密局、國防部第二廳以及內政部警察總署。保密局原本預備編制在國防部第二廳轄下單位，行憲後由蔣中正下令將位階提升至與廳平行，成為國防部保密局。范育誠，〈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改制之研究（1945-1949）〉，頁59-76。

<sup>22</sup> 國史館的《軍情局》檔案所藏之《家風月刊》及《健行月刊》係國防部軍事情報局2010年提供該館製作數位圖像，期刊的時間斷限大約從1954年8月到1968年12月，刊期並不完整。



## 貳、《家風月刊》及《健行月刊》

### 一、在臺復刊的內部刊物《家風月刊》

軍統局在大陸時期即曾發行刊物，最早發行的刊物名為《半月時評》，後來轉變為《家風月刊》。作為內部刊物，僅有部分情報同仁可以閱覽，相當神秘，扉頁上寫有：「機密，閱後焚毀，勿予非同志閱」或是「對外機密」的字樣。<sup>23</sup>顯然將讀者限定在機構內部為主。情報局在臺重新刊行《家風月刊》，作為內部閱覽刊物。在《家風月刊》上，王蒲臣曾經說明刊物由來：

說到「家風」兩字，我有一種異樣的感覺。比如說：「這是某人的家風。」聽到這句話，我馬上直覺到這是某家特有的作風。「創造光榮歷史，發揚清白家風。」戴先生在世的時候，常以此語勗勉同志，但到現在我們全體同志還是把它當作革命的指標。……可見得創造光榮歷史，是在前方形諸於外的；而發揚清白家風是在後方形諸內的。而光榮歷史又必須有清白的家風才能創造，因此更可知道本團體清白家風重要之所在。……為了全體同志不忘清白之家風，曾發行家風刊物一種，大陸淪陷，曾一度停刊，政府遷臺，家風復刊。其發行主旨，在於研究學術，砥礪志行，溝通意志，促進我內外勤同志精誠團結，發揚團體風範，藉以提高工作情緒，增進同志工作技能。<sup>24</sup>

上段引文明白揭櫫《家風月刊》的用意，除了學術研究、傳遞訊息外，就是在促成情報局同志的團結與凝聚向心力。要創造光榮歷史，需要發揚清白家風，發揚清白家風需要健全自己，繼承戴先生的遺志續行革命事業。這裡的「清白家風」如該局人員所言，過去戴笠將軍統局視為一個家庭，同志間即為緊密的手足，應遵守「家規家法」的團體紀律，要有高度的凝聚力。<sup>25</sup>王蒲臣說明特種工作人員應對領袖蔣中正的訓

<sup>23</sup> 亮，「青簡流輝錄（十七）——虎穴生還記」，〈健行月刊（51年12月號）〉，《軍情局》，典藏號：148-120100-0057，頁49；局外人著，蔡登山編，《戴笠與十三太保》（臺北：獨立作家，2013年），頁161。另，〈家風月刊（43年8月號）〉（典藏號：148-120100-0086，頁3）、〈家風月刊（46年7月號）〉（典藏號：148-120100-0095，頁2）的封面均有「機密」等文字。

<sup>24</sup> 王蒲臣曾任軍統局北平站站長，來臺後擔任情報局設計委員會副主任。王蒲臣，「四十四年元旦話家常」，〈家風月刊（44年元月號）〉，《軍情局》，典藏號：148-120100-0091，頁15-19。

<sup>25</sup> 情報局曾有對違反紀律的同志處以「內規」的傳統，在軍統局時期甚至有「制裁」的方

示，都能有深切的認識並且能身體力行，而《家風月刊》正是必要的訓練刊物。顯然王蒲臣認為情報局的內部刊物應多用於闡述領袖的思想與意見，讓局內同志理解後能奉行不渝。但在文末又提及刊物內不妨增加一些詩歌小說，以提升讀者閱讀的興趣。<sup>26</sup>

實則在《家風月刊》復刊初期的內容要求格式並不固定，除了對共產黨政情的分析、共產黨軍事部署的介紹、談情報工作的進行方法外，另有政治性漫畫，如：要求大家捐款拯救大陸災胞，<sup>27</sup>亦包括一些讀書心得、歷史故事、對去世犧牲同志的思念等等。<sup>28</sup>甚至還有一些散文與小說，嘗試鋪陳出一些劇情與架構引起讀者的興趣，但結尾多要比附一些大道理，例如幾經人事波折與人性糾結後，學習到反共抗俄的精神。<sup>29</sup>或是同仁在路上遇到以編織結衣為業的女子，向其求教；雖獲傳授，在結尾卻遭女子曉以大義，要求應理解到總理遺教、領袖訓詞，不應把時間花在小道上，應把時間投注於革命事業。事實上其大部分篇幅都展示毛線衣的打法。<sup>30</sup>從示例可看到是用一個故事去包裝實際要傳遞的資訊，劇情結尾生硬的扭轉，企圖與刊物的宗旨做連結。另外包括一些工作檢討、意見建議、法規說明（軍法講座）、康樂活動紀錄等等。<sup>31</sup>內容編排符合情報工作會報決議中，有關情報人員紀律教育的實施綱要。<sup>32</sup>在

式。局外人著，蔡登山編，《戴笠與十三太保》，頁160；汪士淳，《情治首長汪希苓的起落——忠與過》（臺北：天下遠見出版公司，1999年），頁202-203。

<sup>26</sup> 王蒲臣，「四十四年元旦話家常」，〈家風月刊（44年元月號）〉，《軍情局》，典藏號：148-120100-0091，頁17。

<sup>27</sup> 王新生，「共匪軍事」，〈家風月刊（43年11月號）〉，《軍情局》，典藏號：148-120100-0089，頁8-26；「大家響應救災運動」，〈家風月刊（43年9月號）〉，典藏號：148-120100-0087，頁3。

<sup>28</sup> 王道中，「劉麗川佔領上海始末」；芮之華，「悼亡友徐嘉謨同志」；徐恕，「談學習」，〈家風月刊（43年8月號）〉，《軍情局》，典藏號：148-120100-0086，頁14-23、34、50、68-69。其中「劉麗川佔領上海始末」講述清末小刀會起事攻擊上海的故事。

<sup>29</sup> 法憲，「賭」，〈家風月刊（43年9月號）〉，《軍情局》，典藏號：148-120100-0087，頁47-62。

<sup>30</sup> 熟仁，「代課結衣的女郎」，〈家風月刊（43年12月號）〉，《軍情局》，典藏號：148-120100-0090，頁34-46。

<sup>31</sup> 王蒲臣，「工作檢討會議紀略」；中，「文化康樂園」；一平，「軍法講座—詐欺取財」，〈家風月刊（46年4月號）〉，《軍情局》，典藏號：148-120100-0092，頁19-23、73-78、78-82。

<sup>32</sup> 「四十三年度工作會報通過重要文電工作方案暨總決議案」，〈中央情報機關（四）〉，《蔣中正總統文物》（以下簡稱《蔣檔》），國史館藏，典藏號：002-080102-00013-013，頁24-56。

每年的10月份固定刊出對蔣中正的祝壽專輯，藉以向領袖表達致敬之意。但該刊物呈現更重要的部分是有關三一七大會的紀錄，在每年的3月份或4月份的紀念專刊會有相關記載。

## 二、刊物中關於蔣經國參與三一七大會的記載

三一七大會起源於戴笠在1946年3月17日因飛機事故逝世，為了紀念，改組後的保密局將每年例行的工作會議四一大會移到3月17日舉行，悼念殉職的同仁，並請蔣中正親自出席訓勉。<sup>33</sup> 保密局遷臺後組織改制為情報局，依然保留這項傳統，每年都會舉行，蔣經國親自出席。可見的《健行月刊》（包含《家風月刊》）雖不齊全，但從《家風月刊》中的一篇小記，仍能得窺有關大會的內容及過程。

1957年的三一七大會上午由蔣中正親臨主持，出席者有情報局相關人員，鄭介民、唐縱、陳大慶等與情報局有淵源或是情報治安機構的重要官員。蔣中正親自發表談話表示，戴笠殉職十一週年，毛局長也已過世〔按：毛人鳳，1956年10月14日病逝〕，情報局的全體同仁應效法戴笠的革命精神，將之發揚光大。蔣中正在慰問遺族、參觀展示成果後即離去。<sup>34</sup> 下午的工作暨紀念大會由時任國防會議副秘書長蔣經國親自主持，該會參加人數近千人，蔣經國首先要求眾人發揮情報局的光榮歷史，效法戴笠及毛人鳳對於領袖、對於國家、對於主義的精神，完成反共抗俄的任務，強調對大陸工作的重要性。乍看之下，內容與蔣中正的講述大同小異，實則在灌輸重複的概念，並藉由對戴笠、毛人鳳的追思喚醒情報局同仁對光榮歷史的記憶，以及增進對團體的集體認同感。即便「英雄人物」身不復

<sup>33</sup> 四一大會是為了紀念軍統局成立的工作會議，由局本部科長以上、各公開單位一級主管、外勤站長或副站長出席。沈醉，《軍統內幕》，下冊（臺北：李敖出版社，1989年），頁574。「毛人鳳呈蔣中正為加強臺灣偵防事等」，〈中央情報機關（一）〉，《蔣檔》，典藏號：002-080102-00010-003，頁14-17。

<sup>34</sup> 「三一七」大會作為情報局紀念戴笠集會，在《家風月刊》中剛好有對紀念會過程較為詳細的敘述。參見林時青，「『三一七』大會小記」，〈家風月刊（46年4月號）〉，《軍情局》，典藏號：148-120100-0092，頁14；國防部史政局編印，《毛人鳳傳》，頁4。

存，但他們作為效忠領袖、國家的象徵仍然長存，情報局人員應本此心繼續執行現有的重責大任。

18日早上，情報局在五股觀音山凌雲寺附近舉行對戴笠的公祭，蔣經國亦到場獻花，之後由時任局長的張炎元率眾完成公祭。短短兩天內，蔣經國兩度參與情報局的戴笠紀念活動及儀式，並發表談話，其對紀念儀式之重視不言可喻。其次，在情報局集體追思的場域裡，藉由儀式的參與，加強與該團體的連結。情報局在三一七大會不只展示戴笠和毛人鳳的遺墨，甚至還有播放戴笠過去抗戰時期指揮工作的剪輯影片。<sup>35</sup> 在接下來數天的工作檢討會中，除了各級長官講話，檢討內外勤工作的缺失，還會播放戴笠和毛人鳳的錄音片段，以為同仁訓示。<sup>36</sup> 甚至在毛人鳳的墓地落成時，局長張炎元還率領數百名人員前往致祭，場面莊嚴肅穆。<sup>37</sup> 藉由對過去功績人物的追思儀式，不斷提醒有關人員，從軍統局延續到情報局，一脈相承的歷史。這種自戴笠起由首長領導的家長式作風，為的是使軍統局情治人員發展出向上服從，對團體凝聚高度的認同，同時也為求內部人員能對國家忠誠且專心執行情報工作。

### 三、從《家風月刊》到《健行月刊》

除了前述刊載內容，尚有刊登讀書心得、研究議論、他國國情，<sup>38</sup> 《家風月刊》的走向，情報局內部亦有議論。編輯委員之一的周念行特寫專文說明刊物的研究發展，大體介紹的內部刊物的起源，並說明遷臺後的復刊，主要以訓練同

<sup>35</sup> 林時青，「『三一七』大會小記」，〈家風月刊（46年4月號）〉，《軍情局》，典藏號：148-120100-0092，頁16-18。

<sup>36</sup> 王蒲臣，「工作檢討會議紀略」，〈家風月刊（46年4月號）〉，《軍情局》，典藏號：148-120100-0092，頁21。

<sup>37</sup> 「毛先生墓地落成祝文」，〈家風月刊（46年7月號）〉，《軍情局》，典藏號：148-120100-0095，頁72、93-94。

<sup>38</sup> 編者，「羅曼諾夫『俄羅斯共黨政權的現勢及其未來政策』的評介」，〈家風月刊（46年5月號）〉，《軍情局》，典藏號：148-120100-0093，頁24-28；朱榮培，「現階段的墨子思想」，〈家風月刊（46年5月號）〉，典藏號：148-120100-0093，頁45-47、39；郭薰風，「印尼動盪與華僑陞陞」，〈家風月刊（46年6月號）〉，典藏號：148-120100-0094，頁60-67。類似之文不一一列舉。

仁，溝通意志，提高工作精神及技術為旨趣。在1955年添加了語錄及專題研究。專題研究係指對技術性、情報、軍事學問的專題介紹，而所謂語錄就是指蔣中正和戴笠的訓示。1956年稍作修訂，刊載原則訂為八項，頭兩項為：

一、特別注重國父遺教與領袖訓示中之精神教育與革命哲學之闡揚。

二、戴先生工作精神與工作技術之闡述，其工作精神一項，除強調其犧牲奮鬥之精神外，還須闡述其淡泊寧靜之精神……。<sup>39</sup>

周接著又說明：「又每期均刊領袖訓詞一篇於首端，以為同志研讀之用。總之，本刊內容自始至今，均不曾離主義、領袖、國家、責任，……。」本刊物固然有多種作用，以文會友，聯絡感情，以知輔型，即介紹理論供實務參考，或著是補偏救弊。但是「本刊是兼而有上述作用的，在開創時，便是策勉同志遵循革命大道，在身心兩方面，都要朝兢夕惕，無時或懈，以竟全功，以弘揚清白家風，綿延光榮歷史的。自始至終，都是這種精神教育的工具……」<sup>40</sup>

因此該刊有不少的篇章都在強調精神教育，做好思想工作，大體是怕遭受批評內容空洞，周回覆說明這種以理論供實務參考的精神教育，要設法做到雅俗共賞，並應該要增加專論時評等類型的文章，需要同仁共同努力，《家風月刊》也是時時刻刻在求研究發展。<sup>41</sup>可見《家風月刊》的編輯走向也不是沒有遭受過質疑，但編輯委員還是要強調思想工作、革命理論的闡述是刊物首要目標。

《家風月刊》卷頭語敘明除了領袖、長官的訓示外，將側重於革命理論的闡揚、工作技術的研究、團體生活的報告及黨務運動。<sup>42</sup>在《家風月刊》時期就有人提出建議將刊物停刊或合併，但反對者認為《家風月刊》代表者團體精神〔按：指情報局〕，已是少數自辦刊物應予維持。<sup>43</sup>但在實際情況下，情報局修

<sup>39</sup> 周念行，「本刊的研究發展」，〈家風月刊（46年7月號）〉，《軍情局》，典藏號：148-120100-0095，頁21-24。

<sup>40</sup> 周念行，「本刊的研究發展」，〈家風月刊（46年7月號）〉，《軍情局》，典藏號：148-120100-0095，頁23。

<sup>41</sup> 周念行，「本刊的研究發展」，〈家風月刊（46年7月號）〉，《軍情局》，典藏號：148-120100-0095，頁24。

<sup>42</sup> 「卷頭語」，〈健行月刊（46年8月號）〉，《軍情局》，典藏號：148-120100-0001，頁7。

<sup>43</sup> 王蒲臣，「四十四年元旦話家常」，〈家風月刊（44年元月號）〉，《軍情局》，典藏

正刊物的方向，遂有《健行月刊》的發行。

《健行月刊》的編排上採取比較固定的形式，首篇幾乎一定是領袖訓示，可能是蔣中正在革命實踐研究院、軍事院校，或是國民黨代表大會等與黨、政、軍相關的演講。<sup>44</sup> 其次是局長的訓詞，有時會在兩者間插入蔣經國的訓詞。<sup>45</sup> 編排順序依照職位、體制、與情報局之關聯性。

其次，增加了很多黨部資訊，包括對黨部處理建議彙附表，即針對黨員建議的回覆。工作成績考核統計表，黨部分區，區下再分為小組，各小組均有評分，還有工作成績獎懲表，針對各區做出獎懲。<sup>46</sup> 雖然瑣碎，但反應黨部在情報局中確有實際運作。

另外《健行月刊》在1957年10月，特別出刊毛人鳳的逝世週年紀念專號，內容都是首長張炎元、情報局舊部屬及毛人鳳遺孀的回憶散文及輓詩，還有毛人鳳生前主持最後一次三七大會的講詞，其強調要效法戴笠及先烈的犧牲精神，執行肅奸及發展在大陸的一切革命力量，展開對中共的鬥爭。<sup>47</sup> 而回憶散文提及過往，或記其宵衣旰食，或記其公忠體國，鞠躬盡瘁，但三句不離承繼戴笠遺志，要為領袖、為主義作出貢獻。<sup>48</sup> 足見眾人在追憶，或者在塑造戴笠以降的軍統傳

---

號：148-120100-0091，頁16。

<sup>44</sup> 「總統訓詞」，〈健行月刊（46年8月號）〉，《軍情局》，典藏號：148-120100-0001-008，頁19；「領袖訓詞」〈健行月刊（46年9月號）〉，典藏號：148-120100-0002，頁9-11；「領袖訓詞」〈健行月刊（46年11月號）〉，典藏號：148-120100-0004，頁9-21。

<sup>45</sup> 「朝著光明的前途奮鬥前進—中常委蔣經國先生於民國四十六年十月十九日在本黨第八次代表大會發言詞」，〈健行月刊（46年12月號）〉，《軍情局》，典藏號：148-120100-0005，頁24-25；「副秘書長訓詞」，〈健行月刊（47年2月號）〉，典藏號：148-120100-0007，頁22-24。

<sup>46</sup> 其黨部名為張杰興部，應該是局長張炎元的代號。〈健行月刊（46年9月號）〉，《軍情局》，典藏號：148-120100-0002，頁61-76。另，軍隊設立黨部係為了加強對軍隊的掌握，見孫家麒，《我所認識的蔣經國》，頁36-38。

<sup>47</sup> 「踏著先烈的血跡，大踏步地前進，報效國家、領袖，完成革命第三任務—民國四十三年『三一七』紀念大會上講述」，〈健行月刊（46年10月號）〉，《軍情局》，典藏號：148-120100-0003，頁13-18。

<sup>48</sup> 王蒲臣，「毋忘遺言」；竺啟華，「敬悼毛先生」；毛鍾新，「毛先生的為人」，〈健行月刊（46年10月號）〉，《軍情局》，典藏號：148-120100-0003，頁40-42、48。另，頁25-39有多篇紀念文章，不一一列舉。

統及其形象的時候，毛人鳳不只是實際上擔任局長，且在形象上被視為戴笠的繼承者，再次藉由三一七大會的訓詞帶出情報局的宗旨及對領袖的效忠。在毛逝世週年10月14日，仿效三一七大會，由蔣經國帶領情報體系等相關首長舉行公祭，蔣經國的講詞依然提到情報同仁應承繼戴笠與毛人鳳的遺志，承擔情報局的重大責任，對大陸工作。<sup>49</sup>

#### 四、《健行月刊》中所載蔣經國對情報局大陸工作的指示

隨著時間的推移，蔣經國對黨務、軍隊、情報體系的影響力越來越大。曾任美國中央情報局”（CIA）駐臺代表的克萊恩（Ray S. Cline）在與中華民國的情報體系聯絡時，即曾表示透過接觸發現蔣經國，在身分上雖然只有國防會議副秘書長頭銜，卻是各方面的決策者。<sup>50</sup> 蔣經國作為國家安全政策與執行的實際負責人，克萊恩既以情報工作者的身分來臺與其接觸，顯然會做如是想。

情報局局長張炎元在主持黨部代表大會的時候，提到領袖蔣中正召見大陸工作單位的幹部，指示要設法推進大陸工作，接著又提到蔣經國：

這兩個月來，我們的工作領導者，蔣副秘書長，對我們的工作也有幾次訓示，今天在座的各位代表很多已經聽過了……<sup>51</sup>

作為工作的領導者，蔣經國指示對大陸工作是當務之急，對於大陸的群眾必須了解，對於工作同仁不夠關切，對在大陸工作同仁的後方家屬照料也不夠。要求情報局全力發展對大陸工作，不能拘泥於過去對日抗戰的方式，必須提升與中共鬥

<sup>49</sup> 出席者有鄭介民、陳大慶、王新衡、趙龍文等幾乎都是與情報局有淵源的國安官員，或是軍方高層。叢明，「毛先生逝世周年紀念大會追記」，〈健行月刊（46年12月號）〉，《軍情局》，典藏號：148-120100-0005，頁61、55。

<sup>50</sup> 克萊恩著，聯合報國際新聞中心譯，《我所知道的蔣經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0年），頁25-27。「民國四十八年四月十五日蔣經國於國家安全工作會議演講稿」（1959年4月15日），〈專著手札與講詞〉，《經國檔》，典藏號：005-010503-00030-003，頁80-87。

<sup>51</sup> 「恪遵領袖訓示，完成革命使命——中華民國四十七年元月廿四日主持張杰興部第九屆代表大會閉幕典禮」，〈健行月刊（47年2月號）〉，《軍情局》，典藏號：148-120100-0007，頁31。

爭的技術。<sup>52</sup> 足見蔣中正固然心繫對大陸工作，關乎反攻大業，但實際執行層面已委由蔣經國負責。當然，對於情報局的經費也不時給予支持。<sup>53</sup>

在韓戰爆發初期，美國中央情報局透過「西方公司」的名義，在大陸東南沿海外島設立訓練中心，訓練游擊隊，並支持對大陸的突襲及後方工作。臺、美雙方軍事情報高層並藉此建立直接接觸管道。但在韓戰結束後，中央情報局評估游擊行動效益不高，便逐步中止計畫，將相關業務移交給在臺的美軍顧問團。<sup>54</sup> 美方亦要求臺灣方面發動任何大規模突襲行動，都必須獲得美軍顧問團的同意。<sup>55</sup> 這意味著美方不支持臺灣方面有積極的軍事行動。1954年「中美共同防禦條約」簽訂後，儘管在外島仍迭有衝突，美方還是傾向規範並抑制臺灣方面未來的軍事行動。<sup>56</sup>

縱然如此，自1955年保密局改組為情報局，仍在進行敵後工作。原本國防部大陸工作處承辦的游擊業務及調查局的大陸工作，統一移交給情報局。其負責的對大陸工作，主要是布建情報行動單位，執行破壞任務、心戰政戰工作，架設聯絡電臺，發展地下反共組織，促使大陸人民起來抗暴，以及聯絡少數民族建立游擊的武裝力量等等。<sup>57</sup> 根據情報局自己的記載，在1950到1960年代在東南沿海建立、設置為數不少的聯絡單位及電臺，並在邊區建立游擊武力。但失敗、失聯者

<sup>52</sup> 「恪遵領袖訓示，完成革命使命—中華民國四十七年元月廿四日主持張杰興部第九屆代表大會閉幕典禮」，〈健行月刊（47年2月號）〉，《軍情局》，典藏號：148-120100-0007，頁30-34。

<sup>53</sup> 蘇業光，「瑣事追憶」，〈健行月刊（46年10月號）〉，《軍情局》，典藏號：148-120100-0003，頁13-39。

<sup>54</sup> 雙方曾成立游擊委員會，成員包括鄭介民、毛人鳳等情報機構要員。林孝庭著，黃中憲譯，《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台灣的形塑》（新北：遠足文化公司，2016年），頁300-302。

<sup>55</sup> 林孝庭著，黃中憲譯，《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台灣的形塑》，頁316-317。

<sup>56</sup> 林孝庭著，黃中憲譯，《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台灣的形塑》，頁343-348。

<sup>57</sup> 對大陸工作實則由國防部情報局、國防部情報參謀次長室、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第二組負責。「民國四十八年四月十五日蔣經國於國家安全工作會議演講稿」（1959年4月15日），〈專著手札與講詞〉，《經國檔》，典藏號：005-010503-00030-003，頁75-76；國防部情報局編，《國防部情報局史要彙編》，上冊，頁162-163。



也不在少數。<sup>58</sup> 這些係屬秘密行動，自然不會在刊物上提及太多，但行動失敗就必然有犧牲者，對於行動的成果，情報局內同仁亦有意見表述：

從大陸策動對匪內外夾擊的行動，也要我們去開拓，……檢討起來，幾乎可說交了「白卷」，單就工作的方法來說，就已顯得處處被動，其表現在情報蒐集方面者，只有報什麼，算什麼，不能做到要什麼，有什麼，致無法適應實際的需求，……最基本的問題就是，喪失了我們的工作精神……<sup>59</sup>

該人員提到對大陸工作的客觀條件不允許，同仁也喪失勇氣赴大陸發展的工作精神，鬆弛了工作紀律，無法激勵士氣導致有人推託，有人變節。紀念三一七正是為了工作檢討，凝聚士氣，完成光榮使命。其文末還引用蔣中正過去的說法，在戴笠未殉職前，工作人員多能犧牲奉獻，在戴笠逝世後，情報工作一天不如一天，便藉三一七的紀念專號，向同仁精神喊話，要謹記戴笠犧牲奉獻的精神。

剛好自此以後幾期的《健行月刊》都在封面放上蔣經國的「自反自勉錄」，以及他對情報幹訓班結業典禮的講話、頒獎照片等。<sup>60</sup> 情報幹訓班（以下簡稱情幹班）根據情報局自身的記載，從遷臺後即開始招生，合併其他的電訊訓練班，在1952年訂下訓練班名稱及教育計畫，訓練項目包含政治教育、軍事教育、理論學科、技術學科、職業訓練學科等，受訓時間長達兩年。<sup>61</sup> 1958年的教育計畫再細分，著重於情報、心戰、游擊、通訊等綜合教育，再依學生個性能力劃分實習，很明顯的就是培養敵後（大陸）工作情報人員。其中政治教育係以三民主義、領袖言行（包括訓詞、《蘇俄在中國》等）為主，要培養忠勇愛國，效忠領袖的情報人員。在1954年全國情報工作會報決議中，即有「整飭革命情報工作人員風氣方案」，內容要強化紀律教育，鼓勵情報人員研讀主義及領袖訓示，確立

<sup>58</sup> 國防部情報局編，《國防部情報局史要彙編》，上冊，頁164-177。

<sup>59</sup> 阮清源，「以血、汗、淚再造山河—為紀念四十七年「三一七」而作」，〈健行月刊（47年3月號）〉，《軍情局》，典藏號：148-120100-0008，頁26-29。

<sup>60</sup> 〈健行月刊（47年5月號）〉，典藏號：148-120100-0010，頁1-6；〈健行月刊（47年6月號）〉，典藏號：148-120100-0011，頁4-6；〈健行月刊（47年7月號）〉，典藏號：148-120100-0012，頁4-5；〈健行月刊（47年8、9月號）〉，《軍情局》，典藏號：148-120100-0013，頁5-6。

<sup>61</sup> 國防部情報局編，《國防部情報局史要彙編》，中冊，頁88-90。

犧牲奉獻的決心，並且編纂英雄豪傑忠勇奮鬥的故事分發給情報人員閱讀，以樹立其氣節與俠義精神。<sup>62</sup> 由此可知蔣經國在情幹班畢業典禮的講話，鼓勵學員應效法鄭成功的氣節與精神，不畏艱難，看透生死（意指反攻的精神）等語是有明確的目的。蔣經國指出，情報局雖然因組織變更，名稱有變化，但核心精神是不變的：

但是今天的情報局從戴先生領導以來都是一貫的，因此有許多的同志貢獻出他們的生命，很多人刻苦耐勞、堅苦奮鬥、他們的成功要領，無他，就是一個「忠」字，忠於領袖，忠於國家，忠於黨，忠於主義，……，我們看「忠」字是中央的「中」，下加一個「心」，意思說你這個心必須有一個正確的路線……<sup>63</sup>

如果從情幹班的訓練項目推敲，除了統一情報教育以及技術性的能力外，政治教育當然就是最重要的，要求效忠國家、領袖、黨、人民，在當時的反攻大陸、反共抗俄的時空脈絡下，或可說是想當然爾。但是，特別提到情報局自戴笠領導以來的一貫性，就很值得探究了。情幹班起始以招收自大陸撤退來臺的青年為主，但之後為提升素質，對臺灣及海外擴大招生。<sup>64</sup> 經過政治思想教育的情幹班人員，應當理解蔣經國提及戴笠的用意，以戴笠作為情報局的象徵，期盼情報局幹部效法戴笠這個典範，一脈相承，為情報工作犧牲奉獻。<sup>65</sup> 在之後的訓練班開學、訓練典禮上也說明情報工作除了技術、方法之外，亦特別強調「道義」、「信仰」。<sup>66</sup> 緊接著在下一期月刊，王蒲臣就跟著提出情報局的家風：

<sup>62</sup> 「四十三年度工作會報通過重要文電工作方案暨總決議案」，〈中央情報機關（四）〉，《蔣檔》，典藏號：002-080102-00013-013，頁36-56。

<sup>63</sup> 「蔣副秘書長訓詞：看透生死關頭。堅定革命信仰。完成革命任務」，〈健行月刊（47年6月號）〉，《軍情局》，典藏號：148-120100-0011，頁11-15。

<sup>64</sup> 高明輝從大陸來臺，考取情幹班，自言對未來的工作充滿期待。見高明輝，《情治檔案：一個老調查員的自述》，頁268-271；國防部情報局編，《國防部情報局史要彙編》，中冊，頁100-101。

<sup>65</sup> 「民國五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蔣經國主持情報幹部訓練班第十一期開學典禮訓詞」（1962年11月19日），〈專著手札與講詞〉，《經國檔》，典藏號：005-010503-00035-011，頁1-7。

<sup>66</sup> 意指道義與信仰是超越物質層面，要有比生活更高的理想、信仰；比工作關係更重要的道義關係。「蔣副秘書長訓詞：發揮工作精神；完成光榮任務」，〈健行月刊（48年6月

我們的家風，到底是什麼？說起來很簡單，祇有「忠」與「公」兩個字就可以包括它。為人忠，作事公，這就是我們的清白家風。……戴先生是團體的創始者，他把所有的精神都貫注在團體上，可以說戴先生的精神，就是團體的精神；戴先生的作風，就是團體的作風。他的一生完全是忠於國家，忠於領袖……<sup>67</sup>

在文末王蒲臣還提到擔任戴笠的秘書時，有次關心戴笠病情，遭其斥責應該要認真工作，這比探病更為重要。這樣的敘述形塑了戴笠國家至上的形象，加深讀者體悟戴笠的精神及情報局同仁應效法的作為。

然而作為敵後情報工作人員，走上的可能就是一條不歸路，因此對於情報人員採取精神及物質的交互作用。精神就是講求道義、信仰等層面；物質就是給予金錢的滿足。<sup>68</sup> 擔任過情報局長的汪希苓曾回憶，1950年代作為海軍艦長時運送了不少情報人員到大陸上岸，但約定要接運回來的人員沒有一次出現。<sup>69</sup> 情報局只能對在沿海進行游擊行動成功的人員多作表揚，提振士氣，<sup>70</sup> 讓情報人員懷抱著榮譽感執行任務。

## 五、《健行月刊》中有關蔣經國對情報局要人重視的敘述

到了1959年底，國安局長鄭介民因病過世。鄭介民早年入黃埔軍校後，曾赴俄留學，學習共產黨理論及情報工作組織技術，返國後曾經輔佐戴笠，是戴笠重要助手，更曾擔任保密局長，與情報局淵源極深。<sup>71</sup> 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初期，鄭介民是軍事情報高層，與美方情報系統有過接觸。蔣經國雖然在蔣中正

---

號）》，《軍情局》，典藏號：148-120100-0022，頁35。

<sup>67</sup> 王蒲臣，「讀『談家風』再談家風」，〈健行月刊（47年7月號）〉，《軍情局》，典藏號：148-120100-0012，頁16-21。

<sup>68</sup> 漆高儒，《蔣經國評傳——我是臺灣人》（臺北：正中書局，1998年），頁166-167。

<sup>69</sup> 汪士淳，《情治首長汪希苓的起落——忠與過》，頁196。

<sup>70</sup> 欣山，「四十七年戰鬥英雄簡介」，〈健行月刊（48年元月號）〉，《軍情局》，典藏號：148-120100-0017，頁20-22。

<sup>71</sup> 國史館編，《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12輯（臺北：國史館，1994年），頁517-524。

的支持下，透過國防會議及國安局逐步掌握情報體系，並獲得鄭介民的協助，但對於各情治單位及其要員，仍不時得展現細致的手腕與關切，以示尊重。<sup>72</sup>

《健行月刊》特別在鄭介民病逝當月替出紀念專輯，內容主要是情報局人員對鄭介民的回憶，其中有局長張炎元記載鄭介民逝世時，蔣經國和軍政情報要員紛紛到場協助照料。張炎元感慨在戴笠、毛人鳳之後，鄭介民接著離世是對情報工作的無比損失，一想到戴笠與毛人鳳過去的精神與作風，就應想到如何刻苦奮鬥來發揚傳統家風。此外也特別提到蔣經國對鄭介民的稱讚，文末當然要提及反攻復國的任務。<sup>73</sup> 張文中有三個重點：一、蔣經國親自到鄭介民家現場照料；二、蔣經國對鄭介民的讚譽；三、將戴笠、毛人鳳、鄭介民三人放在一起，顯示三人的歷史地位。此舉既向讀者表示鄭介民過去的不凡之處，與前人一樣是值得效法的對象，也表示蔣經國對鄭介民的重視，抑或是要「呈現」蔣經國的重視。

對鄭的喪禮的記述有更明顯的呈現：

看到領袖兩度蒞臨致哀的那一片莊嚴肅穆引起人們倍加傷痛的氣氛，我們並且看到副秘書長憂戚的面容和我們張先生在領導本局全體同志公祭時忍不住的眼淚……鄭先生實是一位偉大的人物……

極樂殯儀館內外掛滿了輓聯，堆滿了花圈，每天進進出出的是多少將領與要人，這使我們又想起來了毛先生，只有這些偉大的工作導師才獲得如此哀榮，輓聯當中以副秘書長的一副寫得最為沉痛而親切，有「昨日晤談精神猶健靈耗驚傳撫屍痛哭無言……」一句，讀之使人心

<sup>72</sup> 蔣經國曾寫過信函關心鄭介民及毛人鳳的身體狀況，尤其是毛人鳳赴美時的治療情況。「民國四十五年一至十二月蔣經國函復李文成」（1956年1月1日），〈專著手札與講詞〉，《經國檔》，典藏號：005-010502-00765-001，頁19-20、22-24、25-26、28-30、32-36。另見國防部史政局編印，《鄭介民傳》（臺北：國防部史政局，1962年），頁3；唐柱國，《最高機密：高階諜報員首度公開國民黨情報密史》，12-15。

<sup>73</sup> 「……副秘書長在紀念週上稱道鄭先生的為人說：『鄭先生看起來是一個平凡的人，但他的智慧，他的見解，絕不平凡。』……副秘書長說：『鄭先生平常說話都有極正確的見解和重要的意義，他從不隨便說話，更不說沒有意義的話。』……。」他人的回憶也記載類似敘述。張炎元，「平凡的偉大——紀念鄭介公」，〈健行月刊（48年12月號）〉，《軍情局》，典藏號：148-120100-0028，頁20-23；唐毅，「悼念鄭故局長介民先生」，〈健行月刊（48年12月號）〉，典藏號：148-120100-0028，頁35。

酸，我們知道副秘書長當然比我們悲痛更切更深。

副秘書長每天都要到靈堂裡來幾次，異常的沉默，這沉默裡面所蘊含的是無比的沉痛，我們看見除了十六日的公祭以外，他每次來到極樂殯儀館都不進入靈堂，只是在外邊徘徊……我們猜想他不進靈堂實在是怕觸景傷情啊！

最使我們感動的的一幕，是十六日本局全體同志排隊站在靈堂公祭，……當行禮完畢時，大家都是眼淚滿眶，……這個時候，戴先生留下的許多字眼又重新在我們心中盤繞，「清白家風」，「光榮歷史」，「團體」，「家庭」，「同志」，「手足」！

副秘書長站在大門口注視著靈柩過去，注視著一部一部車子載著送靈的人，他最後一部車子跟在大家後面，……我們知道他的心最痛，他要想的最多。<sup>74</sup>

該文對到場致意的黨政要員以對蔣經國的敘述最多，甚至比蔣中正還要多，而且既細微又有諸多情感推測，是否就有意呈現蔣經國的哀痛之情，對軍統要員去世的不捨，或是情報局藉由敘述，展現自身機構是如何備受上級的看重。而情報局成員們在哀淒的氣氛下，想起已逝的毛人鳳以及戴笠留下的文字、訓示，<sup>75</sup> 只能說其對讀者的訊息十分明顯。

到了1960年3月的《健行月刊》紀念特刊，戴笠、毛人鳳、鄭介民三人的遺照依序地擺在雜誌的前幾頁。眾人對三人的記述是以對戴笠的回憶為主線，對毛、鄭兩人的回憶為副線。例如，談戴笠與鄭介民共同展開了「中美合作」<sup>76</sup>；或以毛人鳳繼承戴笠遺志，積勞殞身等等。<sup>77</sup> 刊出的文章持續地述說戴笠的「光榮歷史」，以及情報局對國家的重要性。

<sup>74</sup> 招待組同仁，「靈堂哀榮」，〈健行月刊（48年12月號）〉，《軍情局》，典藏號：148-120100-0028，頁51、64-65。

<sup>75</sup> 招待組同仁，「靈堂哀榮」，〈健行月刊（48年12月號）〉，《軍情局》，典藏號：148-120100-0028，頁65。

<sup>76</sup> 郭壽華，「戴先生鄭先生對『國際問題的看法』——為『三一七』紀念而作」，〈健行月刊（49年3月號）〉，《軍情局》，典藏號：148-120100-0031，頁16-18。

<sup>77</sup> 蔡麟筆，「士德、丹心與革命」，〈健行月刊（49年3月號）〉，《軍情局》，典藏號：148-120100-0031-058，頁68、53。

## 六、《健行月刊》內容的調整及紀念戴笠資料的整理

從1960年8月起由國民黨中央黨部第二組主任葉翔之接任情報局局長，也剛好從8月起，《健行月刊》的刊物專欄有所調整，設立「青簡流輝錄」專欄，專門用以記述情報局的光榮歷史及先烈的壯烈事蹟，並特別註明由該局的局史編纂委員會供給資料，也歡迎同志投稿。<sup>78</sup> 自此起對戴笠的追述多集中在此專欄。刊物為首是領袖訓詞，通常緊接是葉的訓詞。<sup>79</sup> 隨著新局長的上任，刊物的內容也隨即作了調整。

在1961年的三一七專刊，葉翔之特別提出要籌建戴笠的紀念館，要將戴笠、毛人鳳、鄭介民三人及其他犧牲同仁的相關資料整理陳列。<sup>80</sup> 在一年後，戴笠紀念館落成，葉翔之特別說明紀念館落成的意義，紀念館是情報局同仁的精神堡壘，也是承繼革命精神的具體象徵，而且是由情報局同仁共同捐款興建。<sup>81</sup> 此意味著對戴笠的追思及紀念已從言語的敘述、紀念會的儀式，進一步到以具體化的實物作為依憑，試圖展現高度的向心力。情報局人員日後的回憶也認同此舉為團結的精神象徵。<sup>82</sup>

<sup>78</sup> 刊物調整為五大項：一、思想教育；二、工作研究與工作檢討；三、科學技術教育；四、組織工作；五、專欄兩種。見「本刊調整內容、稿費啟事」，〈健行月刊（49年7、8月號）〉，《軍情局》，典藏號：148-120100-0035，頁4-5。該局史的編纂源於國防部注意到史政工作，情報局奉令成立「局史編纂委員會」，由副局長主持召集資深人員協同審核。國防部情報局編，《國防部情報局史要彙編》，上冊，頁5。

<sup>79</sup> 「健行月刊四十九年十一月號目次」，〈健行月刊（49年11月號）〉，《軍情局》，典藏號：148-120100-0038，頁4。「五十年工作設計委員會餐敘會上葉先生即席致詞—闡述本局一年來工作概況籲請提供有關大陸工作意見」，〈健行月刊（51年2月號）〉，典藏號：148-120100-0047，頁29。〈健行月刊（49年3月號）〉，典藏號：148-120100-0031，頁4、67。

<sup>80</sup> 葉翔之，「籌建戴雨農先生紀念館的倡議」，〈健行月刊（50年3月號）〉，《軍情局》，典藏號：148-120100-0042，頁10-11。

<sup>81</sup> 葉翔之，「戴雨農先生紀念館落成的意義—為本局工作三十週年與戴先生殉職十六週年紀念作」，〈健行月刊（51年3月號）〉，《軍情局》，典藏號：148-120100-0048，頁24-27。

<sup>82</sup> 吳建昌，〈懷念葉公翔之先生〉；陳寶富，〈葉公翔之先生點滴〉，收入中華民國忠義同志會編輯，《大略雄才：葉翔之先生百齡冥誕紀念集（1912-2001）》（臺北：中華民國忠義同志會，2001年），頁124、172。

剛好也在1962年的三一七紀念專刊，刊出了局史編纂委員會編寫的〈戴雨農先生傳〉，雖然只是短短不到兩千字，但卻是情報局官方正式敘述，內容重點在於戴笠的功業及其對蔣中正的效忠。<sup>83</sup> 其實《健行月刊》起先除了作為對戴笠回憶紀念的載體外，同時也包括蒐集有關戴笠資料的任務，為配合日後傳記的出版作準備。<sup>84</sup> 其後將1962年起接受訓練、奉派對大陸進行游擊而犧牲的同仁事蹟刊載在三一七紀念專刊，並規定在3月29日舉行追悼大會。<sup>85</sup>

1962年以後的《健行月刊》已少對蔣經國的敘述，引述蔣經國本人的談話、文字的頻率也沒過去來的高，但是依舊刊出其巡視情報局的照片，<sup>86</sup> 或是提出蔣經國對情報工作的重視，要求情報局必須要在對大陸工作上作出實績，切實行動。<sup>87</sup> 葉翔之也提到蔣經國多次蒞臨情報局主持重要簡報。<sup>88</sup> 有時情報局人員尚在刊載的文章中提及，情報局的工作能發揚光大，全靠蔣中正的威望以及蔣經國的英明領導，或是記述蔣經國趁巡視金門之時，參與主持金門的三一七紀念會。<sup>89</sup> 相關的敘述都在呈現一件事，就是蔣經國非常關切情報局的行動，藉以告訴讀者，情報局是如何受到當局的重視。

<sup>83</sup> 局史編纂委員會，「戴雨農先生傳」，〈健行月刊（51年3月號）〉，《軍情局》，典藏號：148-120100-0048，頁8-12。

<sup>84</sup> 葉翔之，〈為編撰戴先生傳記徵求文件資料啟事〉，《健行月刊》，第140期（1969年3月號），頁2。

<sup>85</sup> 史政室，「留取丹心照汗青」，〈健行月刊（53年3月號）〉，《軍情局》，典藏號：148-120100-0060-083-132；拾遺，「碧血黃花吊忠魂」，〈健行月刊（53年4月號）〉，典藏號：148-120100-0061-057。

<sup>86</sup> 〈健行月刊（51年9月號）〉，《軍情局》，典藏號：148-120100-0054，頁4。

<sup>87</sup> 「葉先生訓詞：對粵省邊境爆炸事件的檢討與分析」，〈健行月刊（51年10月號）〉，《軍情局》，典藏號：148-120100-0055，頁23-24。

<sup>88</sup> 葉翔之，「對五十二年本局工作之檢討」，〈健行月刊（53年元月號）〉，《軍情局》，典藏號：148-120100-0058，頁24-25。

<sup>89</sup> 郭壽華，「發揚戴先生精神光復大陸山河」，〈健行月刊（55年3月號）〉，《軍情局》，典藏號：148-120100-0072，頁46；日新，「三一七—在金門」，〈健行月刊（55年4月號）〉，典藏號：148-120100-0073，頁53-55。

### 叁、蔣經國對戴笠的追憶

#### 一、在保密局改制時的運作

對大陸工作（包含游擊工作、建立據點以及情報蒐集等等），有賴情報局人員的忠誠支持與奮力執行，蔣經國主管情治單位後，除了給予實質的關心外，<sup>90</sup>總是不斷地強調戴笠的忠義形象，希望情報局人員能夠效法認同。有謂蔣經國自承對主導情治工作非個人意願，但受命於蔣中正，仍得勉力為之。<sup>91</sup>前已述及，保密局人員剛從大陸撤退來臺的時候是在毛人鳳的領導之下，所有情治單位由「政治行動委員會」先行整合。在蔣中正的支持下，國防會議、國安局相繼成立，國安局長還是由在情報界地位崇高的鄭介民擔任，協助蔣經國掌握並改組各情治機關。有了層峰及情治大老的支持，各項事務應能水到渠成。有一事凸顯戴笠對情報局的象徵意義已發揮作用，有說鄭介民在授課時批評戴笠，當場遭受學員抨擊，雖然記述者認為此事涉及機構的內部鬥爭。<sup>92</sup>但也說明在涉及戴笠形象時得特別小心。對蔣經國來說，如何利用這個象徵進行操作變成最重要的目的。

情治機關的分工及改組，事涉蔣經國對情治單位的掌控，在體制上亦牽涉到組織及員額的核定、人員的調動及機關任務的分派。1955年保密局改為情報局後，保防偵防部分交給調查局，情報局專責對大陸工作，人員也與調查局依分工相互調動，主管國內事務的人員調移至調查局；處理大陸工作的人員調至情報局，人員調動達百人以上，且陸續補充新血。<sup>93</sup>變動幅度頗大，避免使流

<sup>90</sup> 針對保密局官兵罹患肺病，蔣經國希望軍醫署協助解決。「民國三十九年蔣經國信札關於李順卿貪污案應會同保安司令部徹查等」（1952年1月13日），〈專著手札與講詞〉，《經國檔》，典藏號：005-010502-00761-001，頁122-123。

<sup>91</sup> 唐柱國說某次公開場合蔣經國聽聞他人質問為何要做特務工作，蔣經國不悅地回答是受命於蔣中正，不得已而為之。唐柱國，《最高機密：高階諜報員首度公開國民黨情報密史》，頁4。

<sup>92</sup> 唐柱國，《最高機密：高階諜報員首度公開國民黨情報密史》，頁32-33。

<sup>93</sup> 曾永賢認為在人員的交互調動上，蔣經國對待情報局人員較為優厚。曾永賢口述，張炎憲、許瑞浩訪問，《從左到右六十年：曾永賢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2009年），頁130；國防部情報局編，《國防部情報局史要彙編》，上冊，頁161；胡文彬編著，《我國現代情報工作簡史》（臺北：待歸樓叢書之五，1995年），頁82-83。



徙遷臺的情報局人員想起抗日戰爭後組織整併的舊事，蔣經國在1955年的三一七大會上對情報局人員精神喊話：

每年到了今天，我們這麼許多同志都來到這裡參加紀念大會，來追悼我們的戴故局長和歷年死難先烈，這個意義實在太重大了。我們可以這樣說：「戴故局長是一個象徵，他象徵一個優越的革命幹部。處在今天這樣一個危險困難的環境中間，使我們更加懷念到戴故局長的革命精神。」……這一次情報機關的改組，大家不要看作是一個技術性的，一定要把它看作是政治性的，一定要把它看作是革命性的。這就是要集中我們革命的力量，要使得我們革命的工作，分工更精細，合作更嚴密，要使得我們每一個同志的工作崗位都站得很穩；尤其是保密局在改組以後，專門負責大陸上的工作。這此改組的決定，今天應當向各位報告的是，就是領袖把最艱苦的最重要的革命工作，交給我們來負責。……我們應當集中我們所有的意志，所有的力量，一定要把大陸工作做好。我們相信唯有拿這樣偉大的工作成就，來紀念我們戴故局長以及歷年死難先烈，才有意義，才有價值。<sup>94</sup>

蔣經國首先直接點出戴笠具有象徵意義，他的形象是一個優越的革命幹部，在講詞的中間數度提到過去與戴笠的談話，等於告知聽眾，優越的革命幹部應當如何作為。其次說明改組是政治性、革命性的變動，保密局改組為情報局，是專責大陸工作，一方面是告訴情報局人員國家是將最重要的工作交予他們，一方面舉戴笠為例，提醒情報局人員，戴笠精神不死，已成為效忠領袖，續行革命事業的具體象徵。

## 二、重述過往與戴笠互動

為了安撫情報局人員，接續的情報工作會上再次說明情報機關的改組源自於「政治行動委員會」，此次的改組是為了完成情治機關合作分工的體系，持續從

<sup>94</sup> 「民國四十四年三月十七日蔣經國主持情報局三一七大會公祭典禮並致詞發揮大無畏的革命精神」（1955年3月17日），〈專著手札與講詞〉，《經國檔》，典藏號：005-010503-00015-013，頁15-16。

事反共、反攻大陸的事業。但情治機關最重要的精神在於公忠體國，到底要如何作為呢？蔣經國又把當年度三一七的講稿中有關戴笠的言論提出來：

記得抗戰勝利之後，當時我在東北辦理外交〔按：蔣經國時任外交部駐東北特派員，負責對俄談判〕，戴故局長曾經寫過一封信給我。這封信我昨天晚上又拿出來看了一看，他說：「天下的事情總是要人去做的，事情越大，困難一定越多。不過，一個人在危險的時候，不要想到自己的性命；在困難的時候不要想到自己的痛苦，能夠做到這一點，天下就沒有辦不到的事情。」

我又想到另一段經過，在抗戰時期戴故局長曾經好幾次到過贛州，有一次我和他談起法律的問題。他說：「革命的利益就是我們的法律，領袖的話就是我們的命令，工作就是我們的生命。」我們情報工作同志應該深體這三句話的道理，拿這道理做為工作的準備。<sup>95</sup>

這些的過往也在《健行月刊》出現過，可以把它視為精神喊話。蔣經國明白戴笠對情報局人員的象徵意義，藉由回溯他與戴笠的故事，既強化戴笠的形象，喚起聽眾的記憶，也向情報局人員表達他的企盼。此次情報工作會的內容除了機關改組外，很大一部分在談情報工作以及情報人員的操守。1956年的三一七講稿一樣提到戴笠及同志殉職、機關的改組還有對大陸工作等事項。雖然沒有再提起他與戴笠的往事，但直接提出：

戴故局長是我多年的好友，想起他的去世，心裡就難過，但是想起他有這樣多的學生，這樣多的幹部，對他念念不忘，他留下這樣多的革命工作的基礎，他的志願，全體同志繼續不斷的去完成，又覺得應該替戴故局長高興。<sup>96</sup>

身為情報工作的掌握者，先說明自己和戴笠的關聯性，再提情報機關的改組，對

<sup>95</sup> 「民國四十四年四月二十二日蔣經國於劍潭新莊志清堂對情報治安工作人員演講展開新的工作完成新的任務」（1955年4月22日），〈專著手札與講詞〉，《經國檔》，典藏號：005-010503-00016-005，頁20-21。

<sup>96</sup> 「民國四十五年三月十七日蔣經國於三一七紀念大會演講團結奮鬥完成領袖賦予吾人的使命」（1956年3月17日），〈專著手札與講詞〉，《經國檔》，典藏號：005-010503-00020-014，頁3-4。

領袖的效忠及情報局的使命，就是要把這些作為與戴笠的形象做連結，再總結為應在局長毛人鳳的領導下完成任務。同樣手法在當年度的情報工作會議重現：

毛局長告訴我，在這次工作檢討會議中間，除了研讀領袖訓詞以外，還有讀戴先生的遺訓，及講述戴先生的革命事蹟，研究戴先生的遺教，這是非常重要的，其意義就是我們要保持傳統，才能發展新的精神。情報局過去在革命的過程中間是盡了很大的責任，今天更擔當了更大的責任。……我想到本局的工作，想到我們革命的前途，尤其是想到我們戴先生辛苦創造的團體，不只工作上有責任，就是同戴先生私交上也更有責任。……希望全體同志在毛局長的領導下改革進步，達成領袖交給我們的任務。<sup>97</sup>

蔣經國在講詞中不只提到戴笠，也提到人事、經費、機構等實質問題，要求情報局人員保持自戴笠遺留下來的傳統，效忠領袖，且有操守，從而發展新的精神，了解並執行新的使命——對大陸工作。蔣經國很重視對大陸工作，而且要掌握相關的計畫。自毛人鳳過世後，張炎元與葉翔之相繼擔任情報局長，葉翔之自1960年接任至1975年卸任，任期長達十五年，領導多次對大陸的突襲行動。<sup>98</sup> 1962年在情幹班的開學典禮，蔣經國的勉勵學員的演說操作僅更新領導者，如：

我們在工作上不要交白卷，交白卷就是失敗，就是毀滅，所以我深切希望全體同志在葉局長的領導下，把握機會，我們要貢獻一切，來創造我們革命的光榮的歷史。這樣才對得起我們情報局的先烈，才對得起戴故局長，才能夠在將來歷史上寫下一頁光榮的紀錄。<sup>99</sup>

之後蔣經國就較少對情報局人員提到戴笠的事情，合理推測是在葉翔之的任內建

<sup>97</sup> 「民國四十五年三月二十七日蔣經國於情報局第二十四周年工作檢討會演講領袖思想精神組織和方法」（1956年3月27日），〈專著手札與講詞〉，《經國檔》，典藏號：005-010503-00020-018，頁5-14。

<sup>98</sup> 林立，〈葉翔之為蔣經國規劃——“從敵後建黨到大陸革命”〉；唐柱國，〈葉翔之先生——政治上的起落關鍵〉；荊自立，〈飲水思源念翔公〉，收入中華民國忠義同志會編輯，《大略雄才：葉翔之先生百齡冥誕紀念集（1912-2001）》，頁45、16-18、112-113。

<sup>99</sup> 「民國五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蔣經國主持情報幹部訓練班第十一期開學典禮訓詞」（1962年11月19日），〈專著手札與講詞〉，《經國檔》，典藏號：005-010503-00035-011，頁7。

立了戴笠紀念館，作為情報局團體精神的載體，戴笠的具體象徵可隨時呈現，蔣經國就不用再對情報局人員三令五申，使其念茲在茲（有關充實紀念館的內容，容後詳述）。

### 三、偕同梅樂斯參與三一七紀念會的記載 ——中美合作及戴笠形象的回溯

在《健行月刊》1959年3月份的戴笠紀念專號，就如同1958年的專刊一樣，封面封底除放上蔣中正出席主祭紀念會、巡視情報局，以及蔣經國在工作大會上訓示的照片外，也依序放上戴笠與毛人鳳的遺照，顯示毛人鳳就是僅次於戴笠的情報局精神象徵。<sup>100</sup> 1959年的專號相對於過去的紀念專號，同樣多是對戴笠的過往追溯及回憶，撰文者提的是過去工作時與戴笠的接觸及親聞。在八二三砲戰之後，就有人將前者與淞滬會戰時期率領及訓練別動隊的事蹟相連結，強調積極進取冒險犯難的精神。此次另一重點是，梅樂斯（Milton E. Miles）赴臺參加三一七紀念大會。<sup>101</sup>

梅樂斯與戴笠及軍統局的關聯始於太平洋戰爭爆發後，為了蒐集日軍情報及氣象資料，美國派遣海軍梅樂斯中校來華商討合作事宜。在中美雙方幾經交涉，簽訂協定，1943年正式成立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Sino-American Cooperative Organization, SACO，簡稱中美合作所）。由時任軍統局副局長的戴笠擔任主任，梅樂斯擔任副主任。軍統局提供美方在華人員的一切協助；而美方則提供裝備予軍統局所轄忠義救國軍及別動隊，並訓練他們在敵後游擊作戰。<sup>102</sup> 日本投降後梅樂斯奉命返國，戴笠乘坐飛機失事後，梅樂斯曾致電表示哀悼，並且特地到

<sup>100</sup> 〈健行月刊（48年3月號）〉，《軍情局》，典藏號：148-120100-0019，頁20-21。

<sup>101</sup> 周念行，「由金門保衛戰的檢討來體會戴先生的遺訓」，〈健行月刊（48年3月號）〉，《軍情局》，典藏號：148-120100-0019，頁13-15。領袖訓辭，「安慰先烈在天之靈，要照顧遺屬策進工作——中華民國四十八年三月十七日主持本局『三一七』紀念大會講」，〈健行月刊（48年4月號）〉，典藏號：148-120100-0020，頁10-11。

<sup>102</sup> 張力，〈關於中美特種歷史技術合作所的歷史記憶與論述〉，收入國防部軍事情報局編，《中美合作所誌》（臺北：國防部軍事情報局，2011年），頁205-226；吳淑鳳，〈軍統局對美國戰略局的合作及開展〉，收入吳淑鳳等編，《不可忽視的戰場——抗戰時期的軍統局》，頁173-202。該書及兩位學者的文章對中美合作所都有全面及生動的敘述。

南京出席其喪禮，並在墓前植樹。<sup>103</sup> 據載因中美合作所的這段淵源，1959年梅樂斯以退役人員身分且帶病親赴臺灣參加三一七大會；大會過後，由蔣經國親自陪同前往雨農圖書館前憑弔，在館前種植梅樹。<sup>104</sup> 三一七大會每年舉行，梅樂斯何以此時來臺？彼時八二三金門砲戰剛結束沒多久，中華民國政府在美國的協助下守住金門，而梅樂斯與戴笠過去的中美合作所在對日抗戰中發揮作用，有著中美合作共抗強敵的象徵意義。藉由這層歷史淵源，邀請梅樂斯來臺，對喚起情報局在軍統局時期的抗日光榮歷史，有鞏固及激勵的作用，其次透過梅樂斯再次回溯戴笠的英雄事蹟，這點從梅樂斯在紀念會上的致詞可以看出：

我追隨戴將軍工作三年，學到了許多在美國學不到的本領，戴將軍生平只知有國，不知有身；只知有公，不知有私；只知有前進，不知有困難。戴先生偉大的人格，將永遠活在中美合作所的每個老同事的心裡跟各位的心裡。<sup>105</sup>

再對照到當時的記述，三一七大會蔣中正、蔣經國、參謀總長王叔銘、時任國安局長的鄭介民連同梅樂斯夫婦到訪情報局：

他〔按：梅樂斯〕說話的內容，有下列幾點：一、他與戴先生在共事四年餘當中，所學到的東西，比他在美國所接受的教育還多。二、自我介紹他在我國服務的經過，他所服務的這一個機構，為戴先生所主持，是在領袖領導指揮之下，他是戴先生的下屬，無寧說也是領袖的下屬，更是今天參加大會的各位同志的同志與朋友。三、推崇領袖之崇高偉大與英明睿智，在八年艱苦的抗戰中領導了全國軍民打倒了日本軍閥，現在的反共復國大業，仍有領袖來領導我們，堅信一定可以圓滿達成此一艱鉅任務。四、他願以有生之年，竭盡能力，追隨領袖反攻大陸，打倒萬惡的朱毛奸匪。<sup>106</sup>

<sup>103</sup> 費雲文，《戴雨農先生傳》（臺北：國防部軍事情報局，1979年），頁284、307。魏斐德著，梁禾譯，《特工教父——戴笠和他的秘勤組織》，下冊，頁789-790。

<sup>104</sup> 國防部軍事情報局編，《中美合作所誌》，頁23。書中尚有蔣經國與梅樂斯夫婦、戴笠遺族的合影。張炎元原著，李士璉編校，《張炎元先生集》（臺北：作者自印，1987年），頁181。

<sup>105</sup> 費雲文，《戴雨農先生傳》，頁284。

<sup>106</sup> 1960年3月號的健行月刊有放上梅樂斯參加大會以及植樹的照片。淵岳，「永恆的紀念與

與先前不同的是，梅樂斯特別強調順從領袖的領導及反共復國的部分，為的是情報局當時的任務及目的。

要說梅樂斯意欲幫忙反共大業似乎也不與現實相悖，在戰後冷戰氛圍下，梅樂斯因為過去與戴笠有過合作，使他的確符合反共的形象。<sup>107</sup> 不過梅樂斯在返美後幾年內就過世了，蔣經國還特地發電文弔唁。<sup>108</sup> 梅樂斯應邀出席紀念大會，除了他個人對戴笠的情誼之外，蔣經國全程陪同其完成整個追思儀式，在當時的時空脈絡下既有喚醒情報局人員對戴笠、對中美合作所歷史記憶的作用，也同時提醒著現時下的使命。

在1959年國家安全工作會議上，蔣經國對情報治安單位人員演講有關大陸工作、情報工作的重要性時，再次提到梅樂斯與戴笠：

最近梅樂斯將軍從美國來——他是一位海軍將領，在抗戰時期擔任中美合作的美方負責人，當時是與戴故局長並肩工作——他說那時英美人士對於戴故局長都不了解，甚至於有些人認為他是一個殺人魔王，直到現在才慢慢的對他有了認識。梅樂斯將軍並將為戴故局長寫一本書。另外有一位在我們政府服務的人，他過去非常反對戴故局長，前兩天我碰到他，他說在同梅樂斯將軍談話後，已開始瞭解戴故局長的所作所為確實是為著國家的利益。……戴故局長一生中最值得我們敬佩的是甚麼？我認為就是他沒有個人的政治慾望與個人的政治活動。因此，我們祇有

---

回憶—記「三一七」大會」，〈健行月刊（48年4月號）〉，《軍情局》，典藏號：148-120100-0020，頁106-108；〈健行月刊（49年3月號）〉，典藏號：148-120100-0031，頁4、67。

<sup>107</sup> 魏斐德著，梁禾譯，《特工教父——戴笠和他的秘勤組織》，下冊，頁772-773。

<sup>108</sup> 梅樂斯身後由夫人替其出版有關中美合作所的回憶錄，由臺灣新生報編譯。梅樂斯著，臺灣新生報編譯，《另一種戰爭——中美合作所的故事》（臺北：臺灣新生報社，1958年）及《神龍·飛虎·間諜戰：戴笠和看不見的中美合作戰爭》（臺北：臺灣新生報社，1959年）。因梅樂斯夫人曾將原書寄往臺灣，張羣將譯本及摘譯要旨呈給蔣中正，蔣中正批示應交由蔣經國研閱。「張羣呈蔣中正已故中美合作所副主任梅樂斯之夫人來函並附另一種戰爭一書經交行政院新聞局摘譯謹附原書暨譯文本與全書大旨」（1968年2月17日），〈忠勤檔案〉，《經國檔》，典藏號：005-010100-00075-001；「蔣經國電Miles夫人為喪夫致哀」（1961年3月30日），〈一般資料—蔣經國致各界文電資料（十六）〉，《蔣檔》，典藏號：002-080200-00644-015。

為國家為領袖而奮鬥，絕不應再有個人的打算與想法。<sup>109</sup>

梅樂斯有為戴笠洗白之意，但蔣經國要的是藉梅樂斯的到來帶出戴笠的故事，還是為了提醒情報治安人員，戴笠作為對國家、對領袖忠貞的典範。

#### 四、對情報局儀式性行為的想法及對操守的重視

蔣經國理解戴笠對情報局的象徵意義，為了推行情報工作，亦著手強化這樣的象徵並對外表達認同；但他內心對於一些過度的儀式性行為不表贊同，曾給友人李士英的信函中提到：

談話中曾提及毛故局長出喪一事，弟早有同感。另願將弟之日記，抄兄一閱，並非有所申辯，乃能將心中之事，訴告於知己，亦為一快事也：「人鳳兄之喪排場甚大。送喪行列長達數里，經過之處，交通斷絕。且有卡車數十輛滿載武裝士兵護行，余頗不以為然。對此布置，事前並無所知，如此作法，定將使人鳳兄不安於九泉。對公對私皆有害而無益也。再看送喪者形形色色，而出於喪心之哀傷而來者，實無幾人。此種喪禮實庸俗不堪。一旦余如死去，決不願有類似之排場。祇要將余之屍體燒成為灰，由兒女散之於茫茫大海之中（決不可舉行任何儀式），如此則死亦得其安矣。如此死後為余作庸俗之排場，則死後亦將大大的煩惱一番，那真是生亦煩惱，死亦煩惱了。」此為余之日記，亦即弟之心意也。<sup>110</sup>

前述或可反映出蔣經國務實的個性，不喜鋪張。此外蔣經國也常常強調操守的重要，例如情報局長葉翔之卸任後，蔣經國本有意再啟用，但因為葉翔之幼子葉依仁虧空洋洋百貨的案件，打消蔣經國念頭。<sup>111</sup> 其日記曾載：

今日失民心者，乃在於官吏之無能、腐化、貪汙，以及官商風氣之

<sup>109</sup> 「民國四十八年四月十五日蔣經國於國家安全工作會議演講稿」（1959年4月15日），〈專著手札與講詞〉，《經國檔》，典藏號：005-010503-00030-003，頁54-55。

<sup>110</sup> 「民國四十五年一至十二月蔣經國函復李文成」（1956年1月1日），〈專著手札與講詞〉，《經國檔》，典藏號：005-010502-00765-001，頁60-62；張炎元原著，李士璉編校，《張炎元先生集》，頁171。

<sup>111</sup> 唐柱國，〈葉翔之先生——政治上的起落關鍵〉，收入中華民國忠義同志會編，《大略雄才：葉翔之先生百齡冥誕紀念集（1912-2001）》，頁20-21。

敗壞且有惡化之勢，此為我最擔憂者也。

最近葉翔之子放高利貸捲款逃至國外一事，影響民心之大，可以把政府的政績一筆勾消，思之心痛亦愧對百姓與黨國。因為葉某是我所用的……<sup>112</sup>

這顯示蔣經國對官員操守的重視。

蔣經國在接掌情報工作及推行機關改組前，已認識到戴笠形象對情報局的象徵性。無論他心中對一些儀式性的行為和成效是否認同，但為了凝聚人心並推行情報局對大陸工作，他著手強化這樣的象徵，最終還是為了實際事務的推動。

## 肆、追憶中的戴笠形象及「戴笠傳原稿」的運用

### 一、戴笠身後的追憶形象

前已述及情報局藉由對戴笠的紀念和回憶，用以加強情報局同仁的認同感，強調戴笠對國家、對主義、對領袖的效忠，應當效法其犧牲奉獻的精神，要同仁們謹記「光榮歷史」、「清白家風」，要繼承戴笠的遺志，接受蔣中正及蔣經國的領導，持續努力。而蔣經國想要實際掌控情報的工作與權力，對情報局行動有所督促，也得時常藉由儀式性的作為，出席三一七紀念會及公祭等以表達其認同，並爭取情治人員的支持。而戴笠既被視為典範及象徵，自是效法的對象，這一點不斷地在《健行月刊》裡出現。

有關對戴笠形象書寫已有相關的研究，<sup>113</sup> 在此強調的是，在1949年以後戴笠在兩岸的形象是如何被形塑的？戴笠的形象竟然在兩岸若雲泥般的兩極，難以

<sup>112</sup> 蔣經國日記的記述時間是1979年5月1日。轉引自黃清龍，《蔣經國日記揭密——全球獨家透視強人內心世界與臺灣關鍵命運》（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20年），頁161-163。

<sup>113</sup> 鄒文穎，〈特工的歷史形象——以1949年以後臺海兩岸的戴笠書寫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1年），頁182。



捉摸。<sup>114</sup> 有論者認為戴笠形象的塑造剛好符合哈伯瓦克（Maurice Halbwachs）的「集體記憶論點」，主要是社會群體有其對應的集體記憶，使得該群體得以延續，並強化該群體的凝聚力，而社會群體的回憶常是符合某種心理傾向，對過去的建構合理化當前的經驗。集體記憶透過某種媒介，例如文物、圖像或是集體活動來保存，藉由強化集體記憶的印象，來傳遞對群體的認同。群體的定期集會亦能鞏固既有的記憶，而這樣產生的認同是不容易改變的，似乎可以用來解釋情報局人員透過回憶和追思、紀念儀式，形塑成獨特的集體記憶。<sup>115</sup>

情報局人員作為執行情報工作的團體，需要高度的認同與凝聚力，不管是對痛失江山的反省，或是反共反攻大陸的需要，或是合理化過去行為或是未來任務的執行，對戴笠正面形象的塑造及認同都是必要的。透過儀式性的活動，定期的聚會（如三一七大會），形諸於圖像、文字等對戴笠的回憶和紀念（私人著作、內部刊物及編纂局史），能加深既定印象，也能帶出自身的作為，以及過去追隨戴笠的光榮事蹟，增進榮譽感與對團體的認同感。

過去戴笠曾嘗試建構的各式完美概念或無私的英雄典範，以革命者自居，時過境遷來到臺灣，類似的模式亦被情報局和情報工作的主政者套用在其身後的形象上，使其成為凝聚團體精神的具體象徵。

論者亦指出關於早期戴笠的回憶文章多發表在《中外雜誌》、《傳記文學》、《健行月刊》等雜誌。<sup>116</sup> 可惜的是研究者雖指出《健行月刊》卻未見引

<sup>114</sup> 鄒文穎表示在兩岸分治的情況下，戴笠在對岸的形象十分負面，私生活腐敗，與黑幫勾結，暗殺共產黨人等等；而臺灣方面則是以忠義正直，效忠領袖，積極抗日的形象呈現，兩者截然不同。鄒文穎，〈特工的歷史形象——以1949年以後臺海兩岸的戴笠書寫為中心〉，頁2-3。

<sup>115</sup> 哈伯瓦克（Maurice Halbwachs）為涂爾幹（Émile Durkheim）的學生，集體記憶理論的開創者。王明珂，〈集體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當代》，第91期（1991年1月），頁6-19；鄒文穎，〈特工的歷史形象——以1949年以後臺海兩岸的戴笠書寫為中心〉，頁2-3。

<sup>116</sup> 鄒文穎，〈特工的歷史形象——以1949年以後臺海兩岸的戴笠書寫為中心〉，頁109。另如：喬家才，〈戴笠先生的人情味（一）〉，《中外雜誌》，第13卷第1期（1973年1月），頁18-22；費雲文，〈戴雨農軼事（一）〉，《中外雜誌》，第37卷第2期（1985年2月），頁143-148；李甲孚，〈我待在軍統局的那段日子〉，《傳記文學》，第64卷第2期（1994年2月），頁65-72。類似情形不一詳列。

用，想是該刊尚未開放的緣故。除了散見於各刊物的文章，情報局人員也陸續出版關於戴笠的傳記與研究。<sup>117</sup> 而情報局官方出版有關戴笠的生平以《戴雨農先生年譜》及《戴雨農先生傳》（以下簡稱年譜及傳記）為主。<sup>118</sup> 其中有些人員很早就《健行月刊》上撰寫有關戴笠的回憶，時間早於年譜和傳記的出版。所以情報局人員很早就在內部集中並大量地追溯有關戴笠的事蹟與回憶，經過不斷地敘述和整理，再逐步由個人發表到局外的雜誌或出版品。《戴雨農先生年譜》及《戴雨農先生傳》的出版，可視為官方對戴笠在形象論述上的整理。前已說明葉翔之任內已針對局史和戴笠的傳記進行整理。<sup>119</sup>

年譜由費雲文執筆，請情報局相關人員、戴笠的舊部審訂後於葉翔之任內出版，相隔十年之後再次請相關人員詳加修訂出版。<sup>120</sup> 而《戴雨農先生傳》亦是由費雲文撰寫，由資深人員審校後出版。在序文中時任局長的張式琦提到關於戴笠事蹟的文字，日漸增多，其中不乏捕風捉影、誇張附會的著作，為了匡正視聽，流傳後世，遂編纂此書。<sup>121</sup> 有關戴笠年譜與傳記皆按時序從少年到發跡從事情報工作，西安事變時親赴西安隨侍蔣中正等等忠勇事蹟，最多的篇幅在敘述對日抗戰，在情報戰中與日本及汪精衛的情報機關鬥智鬥力並嚴懲漢奸；後藉由中美合作訓練游擊部隊配合國軍對日方作戰、反攻，不時嚴防「共軍」的襲擊。在敘述戴笠豐功偉業的同時，更多的是在維護戴笠忠勇的英雄形象及完美的人格，對負面宣傳進行反制，為戴笠遭受的人身攻擊作辯護，並強調他忠於國家，忠於領

<sup>117</sup> 古僧編著，《戴笠將軍與抗日戰爭》（臺北：華新出版公司，1975年）；良雄，《戴笠傳》（臺北：傳記文學出版社，1970年）；喬家才，《鐵血精忠傳：戴笠史事彙編》（臺北：中外圖書社，1978年）；張霈芝，《戴笠與抗戰》（臺北：國史館，1999年）；王蒲臣，《一代奇人戴笠將軍》（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3年）。

<sup>118</sup> 國防部情報局編，《戴雨農先生年譜》（臺北：國防部情報局，1966年初版，1976年第2版）；費雲文，《戴雨農先生傳》。另，費雲文另編有《戴笠的一生》（臺北：中外圖書社，1980年）乙書。

<sup>119</sup> 毛鍾新，〈一事能狂便少年——戴笠別傳之六〉，《中外雜誌》，第31卷第5期（1982年5月），頁105。毛鍾新曾擔任「戴雨農先生傳記編纂委員會執行小組」成員。

<sup>120</sup> 費雲文不只是戴笠的舊部，同時也是劇作家，除在《中外雜誌》上發表多篇關於戴笠的文章，更以費嘯天為筆名從事廣播劇、電視劇、國劇劇本的創作，在《健行月刊》內也有撰文。王成聖，「序文」，收入費雲文所著《戴笠的一生》乙書。另見國防部情報局編，《戴雨農先生年譜》，頁1-3、389-390。

<sup>121</sup> 費雲文，《戴雨農先生傳》，頁2-3。

袖。<sup>122</sup> 從《健行月刊》也可看到類似的敘述，在說明戴笠的完美人格之餘，還要凸顯戴笠對領袖的忠誠：

蔣經國先生說：「當時戴故局長在的時候，多少人毀謗他！多少人汗辱他！多少人造他的謠言！多少人想打倒他！但是他始終站得牢牢的，這又是甚麼原因呢？我認為第一是戴故局長有一種不屈不撓我行我素的精神。換句話說：我幹我的革命，你造你的謠。同時戴故局長的確能夠捐冤枉受毀謗，他是能夠任勞任怨的革命幹部。……倘使我們本身能夠立定志願來報效國家，報效領袖，那麼天下沒有力量可以阻止我們的革命。」<sup>123</sup>

除維護戴笠的形象，主事者另一目的是對情報局人員的期待，即便一時遭受誤解，也要一心一意地進行革命事業。<sup>124</sup>

還有論者提到在臺情報局人員對戴笠記憶的敘述有高度的一致性。從戴笠的少年時期、對日抗戰時與部屬的相處等等，尤其是在與部屬相處時既處事果決，又具彈性，而且富含人情味的一面。從1970年代的戴笠傳記到2003年王蒲臣的著述大體如此。<sup>125</sup> 但同時也因為具有彈性，顯現出戴笠對制度的遵守深具彈性，對部屬影響很大。例如，敘述戴笠對於執行工作的部屬，經費給得很大方，設法彌

<sup>122</sup> 鄒文穎，〈特工的歷史形象——以1949年以後臺海兩岸的戴笠書寫為中心〉，頁101-102；費雲文，《戴雨農先生傳》，頁245-248。

<sup>123</sup> 這樣的敘述實出自於1955年蔣經國在三一七大會上的講辭。王蒲臣，「戴先生做人之道」，〈健行月刊（53年11月號）〉，《軍情局》，典藏號：148-120100-0068，頁33。

<sup>124</sup> 依據柏楊的說法：「……我到救國團不久，就在包遵彭桌上，看到蔣經國致黨團高級幹部的一份簽名密函，大意說：『有很多同志反對我接管情治機關，認為那是一種特務工作，不符合我的身分……』蔣經國就這一點加以解釋，然後，他說：『關於情報治安工作的法律問題，我曾和戴笠同志談過，他說：革命就是法律，我們身負革命重任，不能處處遵守法律。國家存亡危急之秋，以此與大家共勉。』」言下之意，在危急時刻進行革命事業，不能墨守成規。這和蔣經國之前在三一七大會上的講詞雷同。柏楊口述，周碧瑟執筆，《柏楊回憶錄》（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6年），頁216。

<sup>125</sup> 鄒文穎，〈特工的歷史形象——以1949年以後臺海兩岸的戴笠書寫為中心〉，頁113-120。

補執行任務造成的虧空，但強調錢都用在刀口上，<sup>126</sup> 對於經費申請大筆一揮。<sup>127</sup> 又如，嘗試說明戴笠違反自己的禁令讓部屬結婚，是人情味濃厚。<sup>128</sup> 甚至說明戴笠管制、處分幹部都是從公出發，而幹部也毫無怨言。<sup>129</sup> 這些固然想要藉此塑造戴笠大公無私的形象，同時也透露出戴笠對部屬的實質影響力。<sup>130</sup> 其舊部曾嘗試歸結戴笠的領導統御風格：

戴先生之所以領導同志，出生入死，冒險犯難，成功成仁，義無後顧者，厥為「思想領導」、「精神感格」、「法紀維繫」而已。所謂思想領導，精神感格與法紀維繫，見於戴先生遺訓「理智的運用，情感的結納，紀律的維繫」，即「理」、「情」、「法」三者並籌並顯，……三者之間，以理智為正鵠，以情感為輔導，最後始以紀律補理智、情感之不足，交互為用，互作支援，此即本局工作歷三十餘年而不墜之根基，亦即本局同志，依仰扶持，親若家人之所在。<sup>131</sup>

說明戴笠以理情法三者交互作用帶領過去的軍統局，以法（紀律）為補充前兩者的不足。雖歸結如此，但若依前述部屬的回憶，實際領導運行應仍仰賴戴笠獨特的作為。

而情報局資深人員在回憶時，多強調戴笠如果沒有殉職，則國共局勢不會發

<sup>126</sup> 王蒲臣，「我所認識的戴先生—散記之三」，〈健行月刊（55年2月號）〉，《軍情局》，典藏號：148-120100-0071，頁38-39；拾遺，「永恆的懷念—為紀念戴先生六七冥誕而作」，〈健行月刊（53年8月號）〉，典藏號：148-120100-0065，頁36。

<sup>127</sup> 採訪專欄，〈姜紹謨同志說〉，《健行月刊》，第140期（1969年3月號），頁161。

<sup>128</sup> 據載，軍統局禁止同仁結婚，但戴笠為了電信工作需要，使負責電信工作的魏大銘安心執行任務，破例讓其結婚。喬家才，「戴笠先生的人情味（一）」，《中外雜誌》，第13卷第1期（1973年1月），頁14。

<sup>129</sup> 1955年蔣經國在三一七大會上曾說：「我深深有一個感覺，凡是受過戴故局長處分的同志，始終沒有怨言。就是被關過而且關很久的，但現在一同他們談起，他們對戴故局長也是毫無怨言的，這是戴故局長成功的地方，他管制幹部，處份〔按：分〕幹部，不是站在私的立場，而是站在工作的立場，這一點更加使我們對戴故局長念念不忘。」參見王蒲臣，「戴先生做人之道（續一）」，〈健行月刊（53年12月號）〉，《軍情局》，典藏號：148-120100-0069，頁46。

<sup>130</sup> 鄒文穎，〈特工的歷史形象——以1949年以後臺海兩岸的戴笠書寫為中心〉，頁124。

<sup>131</sup> 郭文翰，「團體即家庭，同志即手足—戴先生二十周年祭」，〈健行月刊（55年3月號）〉，《軍情局》，典藏號：148-120100-0072，頁67-68。

展到今天這般田地，這是為強調戴笠無可取代的特質與才能。<sup>132</sup> 如：

記得三十九年「三一七」，領袖親臨致訓，常說到「戴雨農同志不死，我們不會撤退來臺灣」時，會場很多男女同志不禁黯然飲泣。<sup>133</sup>

在戴將軍殉職之後，國事日非，國共之爭，中共節節勝利，以致中央政府退守臺灣。當時聽到許多人說：「1.假使戴將軍在世，共產黨不會有今天這種猖獗，大陸也不致於丟失了，我們也不會到臺灣來，就是要丟，也不會這麼快。2.假使戴將軍在世，中共決不能在短短一年內，就攫取了整個大陸，中共政權，決不能安坐北平……」<sup>134</sup>

這是藉由緬懷，既是訴說播遷來臺之悲痛，也提到當前目標的艱鉅，但其最主要的目的還是在國共對峙氛圍下提醒情報局人員當下的任務與使命，並鞏固自我認同。

## 二、「戴笠傳原稿」的作用

### （一）官方形塑的戴笠形象

前已述及情報局資深人員對戴笠回憶的高度一致性，以及為了情報局對大陸工作的使命，因循著過去戴笠以降的傳統，將戴笠形塑成一個應當效法的典範。既符合回憶中的光榮歷史，也要說服現役人員對領袖的效忠。蔣經國做為情報工作的實際指揮執行者，除了透過權力要求情報局人員行動，也透過演講提到戴笠的忠義精神，未竟的革命事業，不斷地提醒情報局人員應承繼的使命，並藉由參與追思戴笠以及其他情報人員的儀式，表達其對情報局的需要及爭取情報局人員的認同。蔣經國嘗試加強自身形象與戴笠關係的連結，來構築其與戴笠相知相惜的形象；而情報局的人員亦有意為之，以戴笠的形象加強與蔣經國的連結。

<sup>132</sup> 鄒文穎，〈特工的歷史形象——以1949年以後臺海兩岸的戴笠書寫為中心〉，頁128-129；張霈芝，《戴笠與抗戰》，頁482。

<sup>133</sup> 孫浚，「十年二度『三一七』」，〈健行月刊（47年3月號）〉，《軍情局》，典藏號：148-120100-0008，頁53；王蒲臣，《一代奇人戴笠將軍》，頁64。

<sup>134</sup> 王蒲臣，《一代奇人戴笠將軍》，頁64。

根據王蒲臣的說法，蔣經國曾經表達編寫戴笠傳記的意願：

民國五十六年，蔣院長（經國先生，時任行政院院長〔按：王蒲臣誤植，時任國防部長〕）說：「我個人有兩件事情感覺很遺憾。一件是在七年前我就開始為戴故局長寫傳記，可是七年的功夫，一方面是收集材料困難，一方面是工作繁忙，所以到今天還沒有完成。因為戴故局長的感人事蹟很多，對國家對民族的貢獻很大，我將繼續寫下去，一直到寫完成為止……戴故局長有三種基本精神：第一是不怕敵人的勇氣；第二是不怕困難的意志；第三是不怕犧牲的決心。這三種因素，都是革命成功的主要動力。在革命最後關頭，只有以不怕敵人，不怕困難，不怕犧牲，才能完成總統交付我們的一切責任。」<sup>135</sup>

從王蒲臣的回憶，又證明了蔣經國在傳遞推崇戴笠訊息時，也在向聽眾精神喊話。

王蒲臣想為戴笠寫傳記後續未明。但除了情報局官方出版的「傳記」外，在《經國檔》內的確有一篇「戴笠傳原稿」（以下簡稱為「原稿」）。「原稿」以稿紙寫成，附有繕打好的戴笠年表。該文件前有一頁國家安全局的簽條，內容為：

副秘書長交下戴笠將軍傳原稿乙份附年表，呈閱後擬存忠勤檔案。<sup>136</sup>

短短的簽條說明蔣經國交代將該原稿在呈閱後，即存於檔案中，所以該原稿存於國安局內，時間在1964年8月5日。<sup>137</sup>奇特的是檔案原稿共分六個部分，第一個部分為年表，第二到第五個部分是在講述戴笠的少年到青年階段，到1927年北伐時為止。第六個部分則時直接跳到1938年之後，敘述戴笠與蔣經國相遇的故事。中間闕漏的部分不知是未完成，或是沒有特意保存。<sup>138</sup>而重點是，全文撰寫在註

<sup>135</sup> 王蒲臣，《一代奇人戴笠將軍》，頁245-246。

<sup>136</sup> 「戴笠傳原稿」（1964年8月5日），〈忠勤檔案〉，《經國檔》，典藏號：005-010100-00042-001，頁4。

<sup>137</sup> 「戴笠傳原稿」（1964年8月5日），〈忠勤檔案〉，《經國檔》，典藏號：005-010100-00042-001，頁5。

<sup>138</sup> 根據檔案的目錄，其標題依序為：「戴笠將軍年表。壹、地靈人傑之仙霞嶺。貳、迢迢之逆境造成時代之偉人。叁、活躍在大時代前面。肆、做個無名英雄。廿一、平生最尊敬的

記為「健行月刊稿紙」的稿紙上，顯然與情報局有相當的關聯。檔案收藏時間是葉翔之任內，如前所述，其上任後即大力推動戴笠紀念館的設立以及召集有關人員蒐集、編輯相關文獻，恰好也是情報局對大陸工作如火如荼展開的時刻。

該原稿卷首附的「戴笠將軍年表」只有編到1935年，且內容與後來出版的「年譜」有所出入。例如，年表記載：1906年，10歲，讀完四書五經，始學為文，對立志答：「希聖、希賢、希豪傑」；「年譜」內類似的記載卻是在1910年（「傳記」內容的記載與「年譜」類似）。又年表記載1907年，11歲，轉學仙霞小學肄業。1911年，15歲，秋季升入江山縣立文溪高校肄業；年譜內則是1910年，是年春季，考入江山縣立文溪高等小學校，等等不盡相同。<sup>139</sup> 該是幾經編纂審訂後，才有後者「年譜」的出版。

而「原稿」本傳的部分，敘述戴笠的少年及青年時代，以說故事的方式，敘述戴笠的家鄉環境、家庭生活、求學教育、在外流連交友等事，透過藍太夫人〔按：月喜〕與戴笠對話，傳達母親對戴笠的期望與關心。內容與其說是傳記，不如說是偏向小說的形式，因為行文多了刻劃一些人物環境的細節。與之相比，官方出版的「傳記」，文筆更為流暢，且以第三人稱敘事的方式描繪戴笠的少年、青年時期，著重於其事蹟能力，較少對環境細節的敘述。以內容及形式來說，當然以後者更符合一般傳記的標準。

而兩者的內容亦有異同處，例如，「原稿」記載，戴笠受到一名見多識廣，曾經留學日本的族兄戴春陽的啟發，族兄說明國家大勢，廣東作為革命精神的起源及黃埔軍校的優點，因此讓戴笠決定遠赴廣東報考黃埔軍校。<sup>140</sup> 而「傳記」則是強調戴笠因為在外的聽聞及對國民黨革命史蹟的嚮往，再加上老同學毛人鳳極力的鼓吹因而決定前往廣東報考黃埔軍校。<sup>141</sup> 兩者顯然有所出入。又相似處，如

---

一個朋友。」一共六個項目，沒有中間的章節（伍到廿）。「戴笠傳原稿」（1964年8月5日），〈忠勤檔案〉，《經國檔》，典藏號：005-010100-00042-001，頁2。

<sup>139</sup> 後兩者為同人編纂，內容應為相符。「戴笠傳原稿」（1964年8月5日），〈忠勤檔案〉，《經國檔》，典藏號：005-010100-00042-001，頁1-9；國防部情報局編，《戴雨農先生年譜》，頁2-49；費雲文，《戴雨農先生傳》，頁4。

<sup>140</sup> 「戴笠傳原稿」（1964年8月5日），〈忠勤檔案〉，《經國檔》，典藏號：005-010100-00042-001，頁132-137。

<sup>141</sup> 費雲文，《戴雨農先生傳》，頁7-8。國防部情報局編，《戴雨農先生年譜》，頁12。

「原稿」記載戴笠到的廣州後住到名為「宏信學旅」的小客棧，住了幾天欠了房錢，要被趕出客棧時，幸得一位徐姓青年人出手付款相助；<sup>142</sup>「傳記」則有相同的敘事，並點出年輕人名為徐亮，兩人時常促膝長談，相知相惜。<sup>143</sup>徐亮也曾在《健行月刊》的文章中提到這件事。之後由兩人一同報考黃埔軍校，戴笠考了三次方為中第。此點在「原稿」、「傳記」、「年譜」則皆未提及，是在軍統人員喬家才的著作提到。<sup>144</sup>

另外在「原稿」內與戴笠相識的人，多稱為某某人，冠姓不言名。如，在「宏信學旅」先後結識陝西籍的王某、湖南籍的王某、湖北籍的阮某幾個人等等，應是為了襯托戴笠的地位，在行文中同時會提及戴笠作為同儕中的領導人物。<sup>145</sup>稍對兩者情節比對，主體大致相同，出入情形如在國民黨「清黨」之際，「原稿」以比較詼諧的方式敘述戴笠如何對付「共黨分子」，用計讓敵人吃悶虧；但在「傳記」中的記載，戴笠顯然已深諳人情事故，謀定後動，待時機成熟才將敵人一網打盡。<sup>146</sup>「原稿」、「傳記」兩者在記載上既有相似處，又顯有出入的地方，以出版的時間斷線來看，「原稿」早於「傳記」。前已說明「傳記」係經多人的審訂而成，因此也可以推測「原稿」亦經過多人的「審訂」，或是提供意見，或者可說有關戴笠的傳記事由多人的回憶共同「構築」而成。

## （二）連結蔣經國與戴笠求取傳承

「原稿」在北伐戛然而止，接續便是抗戰時期，前半部有謂戴笠擔任軍統局副局長時，為了避免遠離群眾蔽塞視聽，必須尋找一個能對自己領導工作直言不

<sup>142</sup> 「戴笠傳原稿」，〈忠勤檔案〉，《經國檔》，典藏號：005-010100-00042-001，頁141-161。

<sup>143</sup> 費雲文，《戴雨農先生傳》，頁9-10、頁409-415。1946年戴笠過世後，徐亮在紀念戴笠的紀念文也有提到這個故事。

<sup>144</sup> 徐亮，「紀念戴雨農先生」，《健行月刊》，轉引自張霈芝，《戴笠與抗戰》，頁19-20；喬家才，《鐵血精忠傳——戴笠史事彙編》，頁23-24。

<sup>145</sup> 「戴笠傳原稿」（1964年8月5日），〈忠勤檔案〉，《經國檔》，典藏號：005-010100-00042-001，頁141-167、179-180。

<sup>146</sup> 王蒲臣的文章敘述較「傳記」更為仔細。「戴笠傳原稿」（1964年8月5日），〈忠勤檔案〉，《經國檔》，典藏號：005-010100-00042-001，頁206-210；費雲文，《戴雨農先生傳》，頁11-12；王蒲臣，「戴先生在軍校時期的一頁對共鬥爭史」，〈健行月刊（50年3月號）〉，《軍情局》，典藏號：148-120100-0042，頁27-29。



諱的相知之人。<sup>147</sup>顯然為了鋪陳之後的情節，用以帶出尋友一節。

在「原稿」中，戴笠，不時會接獲各地方的報告，為了向蔣中正呈報各地的真實情況，往往會不辭辛勞地往各地視察。有次視察正是由福建往贛南方向前進，戴笠途經瑞金時看到田園農村風光，猶記過去共產黨統治時殘破不堪，如今卻煥然一新。<sup>148</sup>再往前進到了間茶店休息後便與店主閒話家常，店主提到贛南數縣為國軍收復後重建十分困難，幸好蔣經國專員從江西保安處副處長調來贛南。蔣專員來到贛南組訓民眾，清剿盜匪，親自下鄉巡視，聆聽民意。在其治下民眾有事可隨時找縣長報告，縣長不是處理公務就是下鄉體察民情，處理四散的盜匪。<sup>149</sup>

「原稿」於該部分的標題為：「平生最尊敬的一個朋友」。藉由戴笠巡視地方和店主的對話，帶出了主角蔣經國，並藉由兩人之口大大稱讚蔣經國一番，「原稿」中的戴笠還認為蔣經國是日後能肩負重任的角色。<sup>150</sup>很明顯行文到此處已然破題，引出蔣經國是戴笠最尊敬的一個朋友。接下來「原稿」的敘述將圍繞在戴笠的見聞與兩人相處展開。

戴笠進入贛縣市區後只覺市容整齊，一切井然有序，商業繁榮，歌舞昇平，不禁感嘆蔣經國可為良師。<sup>151</sup>在前往專員公署拜訪時亦特別注意到蔣經國的工作情形，其走在街頭輕裝簡從，觀察食衣住行，物價均較重慶為低。戴笠走到一間名為「陶陶招待所」的旅社，只覺整潔壯觀，旅店服務、取價皆合宜，一問之下才知道是贛南專員公署的公營事業。而街上的公營餐廳提供多樣餐點，服務人員

<sup>147</sup> 「戴笠傳原稿」（1964年8月5日），〈忠勤檔案〉，《經國檔》，典藏號：005-010100-00042-001，頁227-229。

<sup>148</sup> 中國共產黨曾在江西瑞金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並曾遭國軍五次圍剿後展開「長征」。

<sup>149</sup> 「戴笠傳原稿」（1964年8月5日），〈忠勤檔案〉，《經國檔》，典藏號：005-010100-00042-001，頁230-243。

<sup>150</sup> 「戴笠傳原稿」（1964年8月5日），〈忠勤檔案〉，《經國檔》，典藏號：005-010100-00042-001，頁241。

<sup>151</sup> 依據漆高儒所述，蔣經國時任江西省第四區行政督察專員，初任職務時充滿幹勁，制訂三年計畫，維護地方治安，提升人民教育，意在使轄區居民安居樂業，對地方的治理獲得一定的成果。漆高儒，《蔣經國評傳——我是臺灣人》，頁69-74。

則多是淪陷區學生，還能趁假期半工半讀。<sup>152</sup>「原稿」中說在贛南的種種新見聞令戴笠心嚮往之：

這種新的生活，新的社會風氣，如果能推廣推行及於全國，不僅是在抗戰期中增加後方的安定，而且勝利以後，是真正建設理想社會與防共的策略，所以應該以重慶為中心，更進一步就是蔣專員也要在中央主持，那將會使中國的政治提前邁進。現代一般人高叫甚麼民主自由的口號，未必能真正達到民主自由的理想，如今我遍歷贛南幾縣地方，並沒有見到民主自由的口號，而所措施的，卻是民主自由的象徵，這才是知行合一的真諦。<sup>153</sup>

接著「原稿」敘述兩人相識始於蔣經國自俄國歸國，雖屬初晤，但惺惺相惜，任務雖有不同但都身兼抗戰建國的革命大業。戴笠如果途經贛縣必然拜訪蔣經國，兩人時常交換意見，下至生活小事，上至國家大事，無所不談。蔣經國甚至陪戴笠四處參訪，介紹如何建造公用住宅解決部屬的居住問題，令戴笠感佩，自覺收穫不少。<sup>154</sup>

「原稿」接續敘述隨著日軍逼近贛州，戴笠心繫蔣經國的安危，還特別透過中美合作所請託美方以專機接蔣經國返回重慶，在獲得其安全的信息，才放下心中大石。自此後兩人來往益形密切，戴笠有一天接到蔣經國來電說明途經重慶歌樂山，看見警衛取締攤販態度稍嫌過火，應加以斟酌改善，以體察民情。戴笠為此特別感謝蔣經國的提醒，還特別在總理紀念週對軍統局同仁提起此事，要體會領袖親民愛民之意旨。<sup>155</sup>

<sup>152</sup> 陶陶旅運社為江西省公營旅運機構，在江西省各地設有招待所，經營旅宿及輪運。「江西省陶陶旅運社三十六年度預算」（1947年11月20日），〈經費預算〉，《行政院檔案》，國史館藏，典藏號：014-010300-0179，頁14-20。「原稿」背景的素材取自實物實景，想是為了增加現實感。「戴笠傳原稿」（1964年8月5日），〈忠勤檔案〉，《經國檔》，典藏號：005-010100-00042-001，頁245-251。

<sup>153</sup> 「戴笠傳原稿」（1964年8月5日），〈忠勤檔案〉，《經國檔》，典藏號：005-010100-00042-001，頁251-253。

<sup>154</sup> 「戴笠傳原稿」（1964年8月5日），〈忠勤檔案〉，《經國檔》，典藏號：005-010100-00042-001，頁254-258。

<sup>155</sup> 「戴笠傳原稿」（1964年8月5日），〈忠勤檔案〉，《經國檔》，典藏號：005-010100-00042-001，頁261-270。

有趣的是，「原稿」在敘述贛南時期時，只有戴笠對蔣經國的表揚，不見蔣經國對戴笠的直接回應。可見在此文稿表面上主角雖為戴笠，實則為襯托出蔣經國的贛南功績。又「原稿」敘述兩人在重慶來往日益密切，卻未見蔣經國提出對戴笠的評價與表達。一直到多年後的三一七紀念大會中，蔣經國將信件拿出當眾閱讀，表示對戴笠的思念及情誼。而蔣經國也曾在紀念會中發表談話盛讚戴笠為典型革命幹部，希望聽眾能效法戴笠的未竟之志，朝復國、建國的方向邁進。「原稿」提到漫漫長路仍有賴蔣經國的領導。<sup>156</sup>

「原稿」結尾則是敘述若戴笠仍然安在，絕不會讓蔣經國獨自負責「大陳撤退」、在八二三砲戰期間遠赴金門傳令以及視察戰地，絕不會讓蔣經國孤身犯險，蔣戴兩人必將結伴同行。<sup>157</sup>

「原稿」花了不少篇幅以戴笠的口吻去描述蔣經國在贛南的治理成績及兩人的關係密切。但依照敘述的脈絡來看，在兩人的「友情誼」中，戴笠較為主動。「原稿」所敘述蔣、戴關係在「傳記」與「年譜」則未得見，有點耐人尋味，大體是因為寫作的目的與取向不同。有關蔣經國在贛南的治理已有相關記載研究，多給予正面且積極的肯定，不僅有其實績且累積治理經驗。<sup>158</sup> 蔣經國亦自承在贛南的工作，獲得許多做人做事的經驗，但仍應依循經驗為根底持續努力。<sup>159</sup> 有論述指出蔣經國在贛南是勵精圖治，也因為其能獲得較多的資源與援

<sup>156</sup> 「戴笠傳原稿」（1964年8月5日），〈忠勤檔案〉，《經國檔》，典藏號：005-010100-00042-001，頁271-276。

<sup>157</sup> 「戴笠傳原稿」（1964年8月5日），〈忠勤檔案〉，《經國檔》，典藏號：005-010100-00042-001，頁276-277。

<sup>158</sup> 有關蔣經國在贛南的工作，篇章論著繁多，僅列舉如下：陶涵著，林添貴譯，《臺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頁95-124；茅家琦，《蔣經國的一生和他的思想演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3年），頁65-110；徐浩然，《蔣經國在贛南》（臺北：新潮社文化公司，1993年）；劉景星編，《蔣經國先生建設新贛南追記》（臺北：著者自印，2001年）；方世藻，〈論蔣經國「建設新贛南」的社會救濟〉，《抗日戰爭研究》，第1期（2010年1月），頁111-125；朱文原，〈蔣經國在贛南的教育建設及成效〉，《國史館館刊》，第23期（2010年3月），頁119-164。

<sup>159</sup> 蔣經國在貴州旅次寫下對贛南治理的感想，提到要效法王陽明「知行合一」的做事精神，自我檢討，持續努力。但「原稿」特別提到蔣經國的贛南治理，是藉此稱讚在其治下，不用特別呼喊口號，即符合知行合一的真諦。蔣經國，「東望章貢合流——寫給贛南的朋友們」（1946年4月11日），收入何智霖編，《贛南與淞滬筭記》，上冊（臺北：國史館，

助，施政才能推動。<sup>160</sup> 所以「原稿」對蔣經國的稱讚並非全無依據。

蔣經國和戴笠兩人的關係另可從《戴笠史料》等資料一窺端倪。例如，蔣經國從俄國搭乘輪船返回上海，輪船因風雨延誤，戴笠特別發電文給蔣中正說明狀況，表明掌握蔣經國的行程。<sup>161</sup> 蔣經國全家返國後，回到老家浙江奉化溪口鎮。<sup>162</sup> 戴笠亦曾發電文給蔣經國表示，自己身體微恙但已接到蔣經國的來信，之前在上海既未能特別招待，又不能多領教，容日後找機會好好會面。<sup>163</sup> 七七事變後，戴笠曾以電文回覆蔣經國，說明為保衛國家，只能準備抗戰。<sup>164</sup> 又曾發去電文，與蔣經國別久念深，自己在上海主持工作，收到蔣經國的信特作回復，戴笠認為抗戰困難只能堅持下去，蔣經國雖然還在故鄉，但值此時刻，將來必能建立功勳。<sup>165</sup> 這些只能說明了兩人確曾有電文書信往來。戴笠基於效忠領袖的立場，勢必無法對領袖之子蔣經國忽視，至少得作出回應。但戴笠途經贛南，或到贛南工作時與蔣經國晤談，並由其陪同四處巡視，則確有其事：

弟因召開江西工作會議與主持中美合作物資之搶運及因患寒熱病在贛州留醫已旬日矣。弟在此旬日中與蔣經國同志晤談多次，並參觀其所主辦之工廠農場學校等，又親往各大街小巷去視察。深覺其辦事計劃之週到，動作之確實，所費又極其經濟，上下精神團結，彼此情感融洽，而到處均表現清潔整齊。弟深感吾人之不如經國同志遠甚，萬分抱愧。對此間之各種優點，吾人正宜切實效法，萬望兄等對本局各種事務之進行與縲絲廠〔按：即軍統局在重慶的設置據點〕範圍內的各項建設之進行，萬希兄等切實檢討力求改進。吾人做事不可講求形式應處處求切實也，凡一工程之設施必須嚴密監督，力求其堅固切實。而于倉庫、

---

2009年），頁721-724。

<sup>160</sup> 陶涵著，林添貴譯，《臺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頁122-123。

<sup>161</sup> 「戴笠電蔣中正關於蔣經國所乘之蘇聯輪因遇風須明晨方能抵滬」（1937年），〈戴公遺墨—其他類（第3卷）〉，《戴笠史料》，國史館藏，典藏號：144-010199-0003-055。

<sup>162</sup> 陶涵著，林添貴譯，《臺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頁86-87。

<sup>163</sup> 「戴笠電劉乙光轉蔣經國」（1937年），〈戴公遺墨—其他類（第3卷）〉，《戴笠史料》，典藏號：144-010199-0003-044。

<sup>164</sup> 「戴笠電劉乙光轉蔣經國手書」（1937年7月18日），〈戴公遺墨—其他類（第3卷）〉，《戴笠史料》，典藏號：144-010199-0003-041。

<sup>165</sup> 「戴笠電劉乙光轉蔣經國」（1937年10月5日），〈戴公遺墨—其他類（第3卷）〉，《戴笠史料》，典藏號：144-010199-0003-073。

廚房、廁所、浴室、水池、車廠、防空洞、宿舍、辦公室等必須隨時檢查，力求整潔。吾人做事不可敷衍，不可順情，至要至盼。<sup>166</sup>

該電文是戴笠從贛州發給重慶的下屬，說明在贛南曾經和蔣經國多次談話，參觀過當地各項建設後，要求部屬應該效法蔣經國的經營方式，將纜絲廠的各項基礎建設處理妥當，要求細節不可馬虎。這是因為戴笠為使軍統局人員安心工作，對辦公場所及生活福利都有一定程度要求。<sup>167</sup> 又如另一電文：

弟昨蒙蔣經國同志邀往參觀其所主辦之托兒所、幼稚園、正氣小學、正氣中學及其他正在建築之閩贛師範學院，弟見其規模之宏大，計畫之週詳與其工作之切實，與全體工作人員生活之勞苦，情感之和諧，弟實萬分感愧。兄等十年來艱苦與共，熱忱負責，際此團體紀律日形崩潰之時，應如何發聵振聵，挽回此劫運，弟認為先烈犧牲事蹟之宣揚，與同志之訓練，當為當務之急，而本局紀律之整飭，風氣之整頓，又必須處處留心，事事注意，不可有絲毫放鬆半點疏忽也。務希將此意轉達全體同志為幸。<sup>168</sup>

在參觀過各式學校後，戴笠再次稱讚贛南建設之完善，工作人員的團結，想是藉此提醒軍統局的同仁，在抗戰艱難的時刻更應精誠團結，整飭風氣。而托兒所、幼稚園及正氣小學等，正是蔣經國在贛南和當地人員執行教育及社會福利建設的成果。<sup>169</sup>

由此可知「原稿」對於戴、蔣兩人接觸的故事，戴笠對蔣經國的建設大加稱讚等事並非無的放矢，兩人確有相互交換意見。根據戴笠舊部黃康永的說法，戴笠巡察贛州會特別贈禮給蔣經國，並加強與其聯繫。<sup>170</sup> 然而這能否說明兩人交

<sup>166</sup> 「戴笠電毛人鳳並轉廖華平等」（7月13日，年代不明），〈戴公遺墨—總務類（第5卷）〉，《戴笠史料》，典藏號：144-010112-0005-013。

<sup>167</sup> 沈醉、文強，《戴笠其人》（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頁127-128。

<sup>168</sup> 國防部情報局編，《戴雨農先生講詞與遺墨選輯》（臺北：國防部情報局，1976年），頁174。

<sup>169</sup> 朱文原，〈蔣經國在贛南的教育建設及成效〉，《國史館館刊》，第23期（2010年3月），頁140-146；劉景星編，《蔣經國先生建設新贛南追記》，頁204-243。

<sup>170</sup> 朱文楚整理採訪，黃康永等口述，《軍統興衰實錄：國民黨將領的親歷回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頁248-249。

情深淺，無法肯定。但至少能確定基於對蔣中正的效忠，戴笠會特別注意且重視蔣經國的情況與行蹤，例如日軍轟炸蔣經國故鄉浙江奉化溪口，其母毛太夫人不幸罹難，蔣經國專程從贛南趕回處理。<sup>171</sup> 戴笠特別去電重慶，向蔣中正說明其溪口老家的狀況，並告知蔣經國回鄉的消息。<sup>172</sup> 之後亦向宋子文告知蔣經國從故鄉返回贛南的訊息。<sup>173</sup> 又蔣經國曾委託戴笠安排飛機離開重慶，戴笠原本打算前往送行，但蔣經國的回函被屬下延遲至隔天上午才呈閱，曾引起戴笠的不快，意欲懲處下屬。<sup>174</sup> 在《戴笠史料》中除了前述這幾則電文提及蔣經國，其餘則是蔣經國日後在三一七大會上回憶與戴笠的往來。

「原稿」和「傳記」及「年譜」最大的不同處在於多了戴笠與蔣經國的軼事。基於「原稿」出版的時間和目的，應該是藉由建構兩人的往事，敘述蔣經國與戴笠的關聯性，進而加強與情報局的連結。既然蔣經國對情報局人員演講不時提到戴笠，要情報局人員承繼戴笠的遺志，那「原稿」後半部的敘述，假如戴笠仍安在，定會襄助蔣經國度過所有難關，是不是也暗示著承繼戴笠遺志的情報局人員，應向蔣經國表示忠誠。其次，有關戴笠少年時的境況與戴、蔣兩人相遇的故事並非憑空杜撰，足見「原稿」在被構築時參考了多人的回憶與資料，只是寫作的敘述和目的是為了符合當時時空脈絡下，執政者（蔣經國）與追隨者（情報局）的互動與需要，透過蔣經國與戴笠的關聯性，作為認同典範（戴笠）及典範的繼承者——情報局人員，亦將持續執行執政者所交付的任務。

隨著時間過去，臺海兩岸局勢逐漸轉變，而情報局人員與官方對戴笠的追思紀念，則猶未停歇。除了三一七紀念日外，在其每年冥誕時由情報局局長率領局內官員一同祝祭。<sup>175</sup> 在每隔十年的冥誕紀念會（七十年、八十年、九十年），特

<sup>171</sup> 陶涵著，林添貴譯，《臺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頁105-107。

<sup>172</sup> 「戴笠電蔣中正」（1939年12月16日），〈戴公遺墨—其他類（第3卷）〉，《戴笠史料》，典藏號：144-010103-0003-002。

<sup>173</sup> 「戴笠電石樹勛等轉宋子文」（1939年12月16日），〈戴公遺墨—情報類（第4卷）〉，《戴笠史料》，典藏號：144-010104-0004-017。

<sup>174</sup> 「戴笠批示查蔣經國之回信毛鍾新延遲呈閱應負延誤公文之罪」（1944年10月18日），〈戴公遺墨—人事類（第7卷）〉，《戴笠史料》，典藏號：144-010110-0007-051。

<sup>175</sup> 據聞，在戴笠死後其舊屬有在家為其供奉牌位。風雲論壇委員會編輯，《蔣經國浮雕》（臺北：風雲論壇社，1985年2版），頁96。三一七紀念日也逐漸變成情報局人員，追思及相聚維繫情感的日子。劉培初，《浮生掠影集》（臺北：上海印刷廠，1968年），頁

別邀及其舊部屬一同其聚追思。<sup>176</sup> 而蔣經國亦曾送上花圈表示致意。<sup>177</sup> 在1982年情報局五十週年紀念，蔣經國更以總統身分，聲明希望情報局人員能效法戴笠延續為國團結的精神，奮發圖強。<sup>178</sup>

1985年國防部情報局更名為國防部軍事情報局，該局為局慶六十四週年和戴笠的百歲誕辰，於1966年出了一本紀念特刊。特刊封面的扉頁及內頁，刊出戴笠殉職五十週年的三一七紀念法會，多位要員前往致祭、悼念。<sup>179</sup> 其中亦提到中美所美方人員和情報局多年來一直有保持交流聯繫，梅樂斯夫人亦於抗戰五十週年時隨團來臺訪問，回憶過去合作的情景。<sup>180</sup> 期刊內有許多對戴笠的追思文章，強調要承繼戴笠的秉志，持續軍情局的光榮歷史、清白家風，並提到蔣中正及蔣經國過去對軍情局的話語。<sup>181</sup>

為了維繫「所謂團體即家庭、同志如手足」的信念以及傳承戴笠「忠義救國」的精神，軍情局退休人員在1988年成立三一七聯誼會，以葉翔之為召集人。1991年聯誼會再以「中華民國忠義同志會」的名義向內政部申請成立社團，並持續運作至今，其核心任務強調要「傳承忠義救國精神，實踐清白家風」、「編印忠義會訊，妥善蒐編或保管戴先生文物」等事項。<sup>182</sup> 足見其團體的凝聚力，戴笠

---

74-75。「五月十三日為戴先生七秩晉二冥壽」，〈健行月刊（57年5月號）〉，《軍情局》，典藏號：148-120100-084，頁64。

<sup>176</sup> 王蒲臣，《一代奇人戴笠將軍》，頁247-249。

<sup>177</sup> 「汪敬煦呈蔣經國為紀念戴笠八十冥誕事及蔣經國致送花環」（1976年5月21日），〈專著手札與講詞〉，《經國檔》，典藏號：005-010502-00078-019，頁031-035。

<sup>178</sup> 「蔣經國總統手稿—情報局成立五十週年紀念」（1982年3月17日），〈專著手札與講詞〉，《經國檔》，典藏號：005-010502-00771-001。

<sup>179</sup> 刊物內無出版項目，依內文推測應為軍情局編印出版，現於國史館圖書室有一藏本。咸宜君等著，《慶祝六十四週年局慶暨戴先生百歲誕辰特刊》（出版項不詳，1996年），頁9。

<sup>180</sup> 周淑慧，〈永恆之光——記中美所與本局半世紀之久的友誼〉，收入咸宜君等著，《慶祝六十四週年局慶暨戴先生百歲誕辰特刊》，頁47-50。國防部軍事情報局編，《中美合作所誌》，頁24-25。

<sup>181</sup> 謝奇，〈繼續光榮歷史、發揚革命精神〉、翁衍慶、孔祥仁，〈優良傳統『清白家風』一脈相承〉，收入咸宜君等著，《慶祝六十四週年局慶暨戴先生百歲誕辰特刊》，頁23-24、15-18。

<sup>182</sup> 中華民國忠義同志會編印，《大略雄才：葉翔之先生百齡冥誕紀念集（1912-2001）》，頁3-4。〈中華民國忠義同志會簡介〉收入「中華民國忠義同志會網站」：<https://>

做為軍情局典範的象徵性，以及集體記憶的延續性。

## 伍、結論

1949年國民黨政府撤退到臺灣，為了站穩腳步，對政府及黨務進行改造，同時為了穩固對島內統治及之後反共、反攻大陸的需求，重建情治系統，改組情治機關。為了驅使情治系統能確切及忠誠地執行任務，除了意識形態的灌輸、主義的研讀、對領袖效忠的宣傳、資源的分配與給予外，很重要的一點在於樹立一個足供模仿及效法的典範，以作為前面幾點的具體支撐，維持情報人員的榮譽感。

在大陸時期，雖然因為戴笠身故，組織的整併改制以及戰爭的失敗等因素而一度渙散的組織，在撤退來臺後，因應情勢變化，同時為化解新亭對泣的離散感，更需要一個重繫凝聚力的象徵，一個效法的典範，一個對集體記憶的認同。對情報局人員以及執政者來說，戴笠做為過去軍統局的首要人物，其影響力與故事正符合這樣的形象。

在臺灣的情報局人員，雖然面對組織改組的局面，但仍延續過去戴笠嘗試建立的英雄主義及效忠國家、領袖的傳統，不斷地緬懷個人與戴笠過去的抗日事蹟，透過私人的寫作、內部刊物（《家風月刊》及《健行月刊》）的記述，或是官方傳記的編纂，藉由構築與戴笠相處的點滴回憶、紀念，將其塑造成不可或缺的英雄人物、忠貞代表，同時也在形塑情報局人員的自我認同。從過去軍統局即強調內部為一高度凝聚力的革命團體，紀念在抗日作戰中犧牲的同志，在遷移來臺灣後，仍將保有凝聚力，忠於領袖、國家，持續肩負國家交予的重責大任。

蔣經國為了能順利掌握情報系統，並執行情治機關的改組，降低因改組引起的影響，其最終的目的在於，能順利執行反攻大陸、反共的政策目標，對於情報局人員得表達出安撫與重視的態度。其亦將有關戴笠的象徵塑造成為典範，藉由對戴笠的緬懷及過去軍統局重要人士等，儀式性的紀念、追思與宣傳，傳達出對典範肯認，及對追隨者的認同與需要；而追隨者亦對此做出回應，述說主政者的

---

[rocyjccroc.wixsite.com/jycc317/blank-1](http://rocyjccroc.wixsite.com/jycc317/blank-1)（2020/8/20點閱）。



功績，並呈現出自身的重要性。兩者透過對戴笠的共同認同，達成相互連結與各自的目的。《健行月刊》（包含《家風月刊》）中的敘述、蔣經國於三一七大會的講詞以及「戴笠傳原稿」，可以說反映出這樣的關係。

這也顯現出蔣經國在政府組織改組的過程中，嘗試掌控軍情局這樣的特殊團體時，不僅僅倚靠強力的命令與利益交換；同時，在對軍情局人員演說時，也不僅止於談論現實的工作與方法。其尊崇並敘述戴笠的形象，瞭解該形象對軍情局的象徵意義與歷史脈絡，藉此爭取軍情局人員的認同與效忠，增進團體的內聚力，以便達成政權的穩定與政策的施行。

## 徵引書目

### 一、檔案

- 《蔣中正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  
〈一般資料—蔣經國致各界文電資料（十六）〉。  
〈特交檔案〉。
- 《蔣經國總統文物》（臺北，國史館藏）  
〈忠勤檔案〉。  
〈專著手札與講詞〉。
- 《戴笠史料》（臺北，國史館藏）  
〈戴公遺墨—人事類（第7卷）〉。  
〈戴公遺墨—其他類（第3卷）〉。  
〈戴公遺墨—情報類（第4卷）〉。  
〈戴公遺墨—總務類（第5卷）〉。
- 《行政院》檔案（臺北，國史館藏）  
〈經費預算〉。
- 《軍情局》檔案（臺北：國史館藏）  
〈家風月刊〉  
（按：卷名內含號期，為求精簡合併如下）  
43年8月號、9月號、11月號、12月號。  
44年元月號。  
46年4月號～7月號。
- 〈健行月刊〉  
（按：卷名內含號期，為求精簡合併如下）  
46年8月號～12月號。  
47年2月號、3月號、5月號～7月號、8、9月號。  
48年元月號、3月號、4月號、6月號、12月號。  
49年3月號、7、8月號、11月號。  
50年3月號。  
51年2月號、3月號、9月號、10月號、12月號。  
53年3月號、4月號、8月號、11月號、12月號。

55年2月號～4月號。

57年5月號。

## 二、史料彙編

何智霖編，《贛南與淞滬笥記》。臺北：國史館，2009年。

國史館編，《國史館現藏民國人物傳記史料彙編》，第12輯。臺北：國史館，1994年。

國防部情報局編，《國防部情報局史要彙編》，上冊、中冊。臺北：國防部情報局，1962年。

國防部情報局編，《戴雨農先生講詞與遺墨選輯》。臺北：國防部情報局，1976年。

## 三、文集、回憶錄、訪談錄、年譜

朱文楚整理採訪，黃康永等口述，《軍統興衰實錄：國民黨將領的親歷回憶》。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4年。

沈醉，《軍統內幕》。臺北：李敖出版社，1989年。

柏楊口述，周碧瑟執筆，《柏楊回憶錄》。臺北：遠流出版公司，1996年。

荊自立，《雲煙往事》。洛杉磯：美國洛杉磯世界日報，2014年。

高明輝，《情治檔案：一個老調查員的自述》。臺北：商周文化公司，1995年。

曾永賢口述，張炎憲、許瑞浩訪問，《從左到右六十年：曾永賢先生訪談錄》。臺北：國史館，2009年。

張炎元原著，李士璉編校，《張炎元先生集》。臺北：作者自印，1987年。

國防部情報局編，《戴雨農先生年譜》。臺北：國防部情報局，1976年第2版。

費雲文編，《戴雨農先生全集》。臺北：國防部軍事情報局，1979年。

劉培初，《浮生掠影集》。臺北：上海印刷廠，1968年。

蔣經國先生全集編輯委員會編，《蔣經國先生全集》，第4冊。臺北：行政院新聞局，1991年。

#### 四、專書

中華民國忠義同志會編，《大略雄才：葉翔之先生百齡冥誕紀念集（1912～2001）》。臺北：中華民國忠義同志會，2001年。

王蒲臣，《一代奇人戴笠將軍》。臺北：東大圖書公司，2003年。

汪士淳，《情治首長汪希苓的起落——忠與過》。臺北：天下遠見出版公司，1999年。

局外人著，蔡登山編，《戴笠與十三太保》。臺北：獨立作家，2013年。

克萊恩（Ray S. Cline）著，聯合報國際新聞中心譯，《我所知道的蔣經國》。臺北：聯經出版公司，1990年。

沈醉、文強，《戴笠其人》。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

林孝庭著，黃中憲譯，《意外的國度：蔣介石、美國、與近代台灣的形塑》。新北：遠足文化公司，2016年。

胡文彬編著，《我國現代情報工作簡史》。臺北：待歸樓叢書之五，1995年。

茅家琦，《蔣經國的一生和他的思想演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03年。

風雲論壇委員會編輯，《蔣經國浮雕》。臺北：風雲論壇社，1985年2版。

唐柱國，《最高機密：高階諜報員首度公開國民黨情報密史》。臺北：新新聞文化公司，1997年。

孫家麒，《我所認識的蔣經國》。香港：大生活出版社，1975年。

陶涵（Jay Taylor）著，林添貴譯，《臺灣現代化的推手——蔣經國傳》。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00年。

國防部史政局編，《毛人鳳傳》。臺北：國防部史政局，1962年。

張霈芝，《戴笠與抗戰》。臺北：國史館，1999年。

戚宜君等著，《慶祝六十四週年局慶暨戴先生百歲誕辰特刊》。出版項不詳，1996年。

喬家才，《鐵血精忠傳：戴笠史事彙編》。臺北：中外圖書社，1978年。

黃清龍，《蔣經國日記揭密——全球獨家透視強人內心世界與臺灣關鍵命運》。臺北：時報文化出版公司，2020年。

費雲文，《戴雨農先生傳》。臺北：國防部軍事情報局，1979年。

費雲文，《戴笠的一生》。臺北：中外圖書社，1980年。

漆高儒，《蔣經國評傳——我是臺灣人》。臺北：正中書局，1998年。

鄭鐸編著，《軍情局密史》。臺北：聯豐書報社，1988年。

魏斐德（Frederic E. Wakeman）著，梁禾譯，《特工教父——戴笠和他的秘勤組

織》。臺北：時英出版社，2004年。

## 五、期刊論文、專書論文

方世藻，〈論蔣經國“建設新贛南”的社會救濟〉，《抗日戰爭研究》，2010年第1期（2010年1月）。

王明珂，〈集體歷史記憶與族群認同〉，《當代》，第91期（1991年1月）。

王蒲臣，〈戴笠將軍與中國特工（一）〉，《暢流》，第57卷第12期（1978年8月）。

毛鍾新，〈一事能狂便少年——戴笠別傳之六〉，《中外雜誌》，第31卷第5期（1982年5月）。

朱文原，〈蔣經國在贛南的教育建設及成效〉，《國史館館刊》，第23期（2010年3月）。

李甲孚，〈我待在軍統局的那段日子〉，《傳記文學》，第64卷第2期（1994年2月）。

吳淑鳳，〈軍統局對美國戰略局的合作及開展〉，收入吳淑鳳、張世瑛、蕭李居編，《不可忽視的戰場——抗戰時期的軍統局》。臺北：國史館，2013年2刷。

〈姜紹謨同志說〉，《健行月刊》，第140期（1969年3月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藏散本）。

陳鴻獻，〈1950年代初期國軍政工制度的重建〉，《國史館館刊》，第42期（2014年12月）。

張力，〈關於中美特種歷史技術合作所的歷史記憶與論述〉，收入國防部軍事情報局編，《中美合作所誌》。臺北：國防部軍事情報局，2011年。

喬家才，〈戴笠先生的人情味（一）〉，《中外雜誌》，第13卷第1期（1973年1月）。

費雲文，〈戴雨農軼事（一）〉，《中外雜誌》，第37卷第2期（1985年2月）。

葉翔之，〈為編撰戴先生傳記徵求文件資料啟事〉，《健行月刊》，第140期（1969年3月號，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圖書館藏散本）。

劉熙明，〈蔣經國與蔣中正在戒嚴時期“不當審判”的角色〉，《臺灣史研究》，第6卷第2期（1999年12月）。

蕭李居，〈戴笠與特務處情報工作組織的開展〉，收入吳淑鳳、張世瑛、蕭李居編，《不可忽視的戰場——抗戰時期的軍統局》。臺北：國史館，2013年2

刷。

羅久蓉，〈從軍統局到保密局〉，收入吳淑鳳、張世瑛、蕭李居編，《不可忽視的戰場——抗戰時期的軍統局》。臺北：國史館，2013年2刷。

Philips, Steve E., "Taiwan's Intelligence Reform In An Age of Democratization," *Reforming Intelligence*.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2007.

Yeh Wen-Hsin, "Dai Li and Liu Geqing Affair: Heroism in the Chinese Secret Service During the War of Resistance,"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48:3(August 1989).

## 六、學位論文

石佳音，〈中國國民黨的意識形態與組織特質〉。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博士論文，2008年。

金智，〈蔣經國與臺灣黨國體制的建構(1949-1952)〉。臺南：國立成功大學歷史研究所博士論文，2008。

范育誠，〈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改制之研究（1945-1949）〉。臺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6年。

鄒文穎，〈特工的歷史形象——以1949年以後臺海兩岸的戴笠書寫為中心〉。臺北：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系碩士論文，2011年。

## 七、網路資料

〈中華民國忠義同志會簡介〉，收入「中華民國忠義同志會網站」：<https://rocjyccroc.wixsite.com/jycc317>（2020/8/20點閱）。